

淮安历史与文化

2018年第二期 季刊

主办

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卷首语

淮安名人

运河文化

考古发现

地方史料

三年史话

文化动态

读者文化

栏目文化

淮安年谱

关于推进我市研学旅行工作的建议

张智勤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旅行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对中小学生而言具有教育价值；对旅游业而言，属于一种新型旅游产品，具有产业价值。我市的全域旅游战略也期待着新的旅游增长点。但由于研学旅行存在政策保障、安全、资金、研学产品及专业人才缺乏等制约因素，我市教育部门举步维艰，研学旅行工作裹足不前，需要下大力气来解决。

一、出台配套扶持政策。早在2016年国家教育部等11部门就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意见》对研学旅行，提出了规范，建议市政府尽快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地方需要的配套政策，将上级的政策变成本地可操作的实施意见和办法，让教育等部门有章可循，避免各行其事，各自为政。

二、综合施策确保安全。研学旅行活动参与人数多，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压力巨大。研学旅行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建立安全保障体系，明确各方安全保障责任，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事实证明只要安全责任主体明确，安全过程细化，安全保障措施到位，是可以解决好安全问题的。

三、改变理念加大投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是长期的、隐形的，不如其他引资项目立竿见影。决策者需要有“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须有我”的胸襟与担当。要加大我市历史文化基础研究、研学旅行产品开发、研学旅行基地建设、义务阶段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经费、专业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投入，舍得在“润物细无声”的项目上分一杯羹。

四、成立专门的研学旅行机构。对研学旅行进行规范管理。应由地方政府牵头，教育部门协调建立地方研学旅行工作的联席会议制度，统一统筹相关工作。教育部门内部也应设专门的职能处室，统一协调管理、考核。

五、推动研学旅行与旅游开发的结合和互促。充分利用我市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尽快推出我市首批研学旅行示范基地、推荐研学旅行名录等，全力打造研学旅行优质产品，以期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外中小学生及其他游客。这既能充分发挥文化旅游资政、育人的教育作用，又能促使我市旅游业大发展，达到一举两得之功效。

（作者系民进淮安市委副主委）

淮安历史与文化

Huaian LiShi Yu WenHua

2019年第1期 | 总第43期 | 出版日期:2019年03月05日 | Jan 05 2019

联合出品单位 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编 季祥猛 李 倩

副主编 葛以政 杜 涛
徐业龙 严 斌
刘 飞

执行主编 葛以政 吴 玮

编辑 刘 冰 朱维明
郝宇铭 陈 瑾
黄美艳

封面题字 曹启瑞

美术编辑 朱维明

主办 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联办 淮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委
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办
淮安市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淮安市档案馆
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淮安运河博物馆
周恩来故居管理处
吴承恩故居纪念馆

主管单位 淮安市社科联

地址 淮安市翔宇南道1号

电话 (0517)83606013 89668072

承印单位 江苏农垦机关印刷厂有限公司



编委会

顾问

花法荣 荀德麟 钱仓水
汪 浩 马超骏 张 强
安 宇 陶书中

主任

曹启瑞 张冲林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革 王贻文 成兆友
庄建禾 寿新浩 李 倩
李巨澜 李梅娟 杨发余
杨春龙 张传明 季祥猛
金志庚 金德海 周 平
周智如 费香峰 袁 来
徐 克 高岱明 席雨中
葛以政 魏廷贵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青 王 剑 王卫华
王继华 王新葆 叶占鳌
张志军 朱云毕 朱维明
刘 飞 刘 冰 严 斌
吴 玮 杜 涛 杨江淮
陈 琳 陈 瑾 庞廷娅
郝宇铭 夏宝国 徐业龙
徐晓虎 徐朝红 常贵章
葛晓丽



淮安文史网
微信公众号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CONTENT

2019.1
目录

> 卷首语

- 01 关于推进我市研学旅行的建议
民进淮安市委

> 淮安名人

- 04 周恩来童年在老家五个地方读书始末
秦九凤
- 08 潘德舆·丁晏·王锡祺
——清代淮安三位学者 胡健
- 12 韦恂的教育人生 於剑山
- 15 清朝巨商“程震泰”经商和持家之道 程翼云

> 运河文化

- 18 清口枢纽中的顺黄坝及其河神庙 葛以政
- 23 运河中埂切除记 申卫华

> 考古馆藏

- 25 高铁新区水系调整工程考古工作现重大成果
胡兵 刘冰
- 31 盱眙博物馆馆藏西晋佛像造像砖鉴赏与探究
罗志
- 33 淮三路探源 张其书
- 34 清江大闸出土的康熙《阅河》诗碑述略
胡锦涛
- 36 博物馆应成为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
潘新 赵巧凤

> 地方史料

- 39 记华中第一次群众工作会议 於剑山
- 43 陈毅与洪泽湖 钱万平

- 44 “淮上三美”——林颖 王海洋
- 46 新四军瓦解淮宝地区刀会纪事 赵光明

> 三亲史料

- 49 淮阴仁慈医院1948年大火前后 何永年
- 52 乐走“南京路” 蒋长明
- 53 老澡堂——幸福池 郭应昭
- 55 改革开放后淮安市收藏市场的兴起与发展
胡彬 季玉华 王学海

> 文化动态

- 58 心生莲花开 笔墨抒情怀 周毅之

> 美食文化

- 60 大闸蟹：下一张给世界的中国名片
钱仓水

> 谱系文化

- 62 吴氏的前后两个“三让王” 吴绪略

> 淮安年谱

- 64 (十九)清(11)

封二 文旅融合打造幸福年味 刘冰

封三 淮安春节文化活动剪影

周恩来童年在老家五个地方读书始末

■ / 秦九凤

周恩来出生于书香门第。按《周氏家训》记载,周家规定男孩子“五岁入家塾,习颜体。”意思是说,五岁的男童就送进家塾馆读书,用毛笔写颜真卿的楷体。周恩来12岁离家前曾先后在淮安的驸马巷周家塾馆、清江浦十里长街以北的万家塾馆和十里长街南侧的陈花园塾馆读书,而1908年夏天曾随嗣母陈氏去宝应水巷口陈家和淮安东岳庙龚家读书。

周家塾馆

周家世居浙江绍兴,到清道光十九年(1839)由周恩来曾祖周光勋、叔曾祖周光焘兄弟俩以260两白银从原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一住户胡干臣手中购得一套老宅。从此,这老兄弟俩及其后代便在淮安定居下来。

那时像周家这样的官宦人家每到新住地定居后,第一件事就是还要买下一块墓地,因为“人有旦夕祸福”,要预防不测。其次就是要找一个好的老师,开设家塾馆,让孩子能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这既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做法,也是周家的一个优良传统。所以,周家在买下驸马巷房子后,很快就在淮安城东门外的夏庄买下一块墓地,同时在新居内沿东边驸马巷一侧辟了有三间房子的一处家塾馆。

到周恩来去周家塾馆读书时,已经是周家定居淮安70多年、繁衍几代人以后的事了。据周恩来故居所藏1983年5月4日在北京医院802病房采访周恩来嫡亲弟弟周恩寿先生的一份笔录,当时周家塾馆的先生“不是姓胡,就是姓孔。姓胡的可能性大点。”按《周氏家训》男童5岁入家塾的做法,周恩来当是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节后到家塾馆读书的。



旧时,孩子上家塾馆是有个开蒙仪式的。仪式的内容有拜孔子、拜先生等等。但据上边周恩寿的那份笔录记载,他对哥哥周恩来第一天上学时举没举行开蒙仪式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据笔者判断,到周恩来五岁时,周家已经非常败落,举办开蒙仪式似乎不太可能,但依据当时儿童入学习惯,带点粽子、圆盘糕、放一挂小鞭炮等是可能的。因为粽子、圆盘糕到校后由先生分发给他的同学们,寓意“圆满、高(糕)中(粽)”。

周恩来在周家塾馆读的主要是当时的“三、百、千、千”等启蒙书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之类。因为当时大小学生都在一个教室念书,记忆力超强的周恩来也听了那些年长的学生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使他的知识面大为拓宽。

周家塾馆的教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把周家的老祖宗、北宋大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也作为蒙童的教学内容之一,其篇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名句也是老师必



教,学生必学的课程。

周恩来只在周家塾馆读书一年就随父母去了清河县外公万家塾馆寄读了。

万家塾馆

周恩来为什么要到离家三十余华里外的清江浦外婆家读书呢?

早在周恩来出生时,周家已急剧败落,每日只有出的,没有进的。平常靠几位在外做事的叔伯们资助维持生活。碰上资助未能及时到又没借到钱时,便悄悄地典当衣物糊口,因为封建家庭爱面子,即使穷了,典当衣物的事也不能让外人知道。

就在周恩来在周家塾馆读书一年后的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春节,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偕同丈夫和周恩来、周恩溥兄弟俩回娘家给万老太太(周恩来外婆)拜年。他们在清江浦十里长街上逛街看热闹时,经不住一处卖彩票的人摇唇鼓舌,由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和周恩来十八舅万立鈔一起花一块大洋合买了一张救灾彩票。没想到秋后公布中彩彩票号码时,这张彩票竟然得了个头奖!奖金是一万块光洋。这要是落到当时一个普通人家的话,就足以富裕一两代人。可是他们是个大户人家,首先因为彩票是两人合买,奖金由周、万两家平分,各得五千。再就是周恩来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很会花钱。当她和丈夫一道乘轮船去汉口领取奖金时,早就考虑这笔奖金的使用了。五千元的银票一兑到手,万氏就给自己买了一件豹皮大衣,还买了一台当时特时髦的“留音机器(即留声机)”。归淮回家后,她又将从周家朝东的大门外往南至响铺街(今镇淮楼西路)的一段驸马巷的街道全部铺上砖头,以方便人们出行。

晚上夜深人静时,万氏想到,她嫁到周家的六年多时间内,先后生了周恩来、周恩溥、周恩寿三个男孩。恩来虽过继出去,但作为他嗣父的周贻淦已病故,嗣母陈氏又恪守妇道,不再嫁人。所以这三个男孩子的抚育,上学读书和日后娶亲成家等等都得由他们夫妇管。而周家当时已是债台高筑,入不敷出。他们彩票中奖的消息一传出,便有债主上门讨债,社会上热心公益的人也上门讨要赞助,门口站立的和尚、尼姑

化缘的也比平时多多了,连原来周家的丫环、使女、乳母、轿夫等也陆续上门讨喜钱。可以说,由于他们这张彩票的意外中奖,使往日宁静的驸马巷周家成了一个花钱的无底洞。万氏经与丈夫周贻能商量后决定:回清江浦娘家生活,以避开周家这个用钱的“无底洞”。

就这样,周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随父母(包括嗣母陈氏。乳母江氏也像亲戚一样常来走动)等一起来到了清江浦万公馆。据周恩来故居所藏一份由周恩来外公万青选的嫡曾孙万寿徵于1982年6月14日签字负责的笔录记载:“周总理全家迁居淮阴是1904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当时我祖父万立钟(周恩来六舅)因到板浦(时属海州,今属连云港市)盐场做事,我们六房头的一部分人要从淮阴搬去板浦。因为替总理全家迁淮阴准备房子,我们搬家到板浦推迟了几天。”

周恩来他们一家人迁居清江浦后,周恩来、周恩溥兄弟就进了万公馆的家塾馆读书了。



陈家花园塾馆

周恩来在万家塾馆读书时,由于教他们的先生是位落第秀才,他梦寐以求的是有一天能考中举人。后来科举废除了,他也梦想能考出一个好成绩,好出人头地,因为他信奉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理念。这样的先生把他的一门心思都放在准备来年再考上,温习自己功课是他的主要任务,教书只不过是他在想混点学关钱(现在叫学费)而已。这样,先生在上课时还是教授“三、百、千、千”这些孩童读的启蒙书籍。这对早已能倒背如流这些书的周恩来来说,内心很难平

静,每天在教室里无法安坐。可是,作为儿童的周恩来无法解脱,更何况,当时儒家倡导的“天、地、君、亲、师”是至高无上的,周恩来怎么能反对呢?

万般无奈的周恩来最后同万家塾馆先生来了个“君子协定”:每天周恩来准时到校,然后自己一个人到外公书房看书,放学时和其他同学一道回家。然而,这样相安无事的师生相处还是被心细如发的嗣母陈氏发觉了:由这样的先生教书岂不是误人子弟?!加之万家也是个名门望族,王府大院内人多嘴杂,嫁出门的姑娘回娘家住久了也难免会和娘家人发生一些小矛盾。连幼小的周恩来等也曾被无端地委屈过。万氏妈妈是位生性要强的人,她自己受点委屈尚能忍受,但她不能容忍自己年幼的儿子无端被委屈。这样,基于万家塾馆先生的无心教书和在王府生活的不愉快,万氏妈妈和陈氏妈妈妯娌俩一商量,就决定买下坐落在十里长街之南陈家花园的十四间房子,作为周家在清江浦的临时寓所,并自请教书先生开办了属于自家的家塾馆。

两位妈妈(时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已外出谋生)雇请的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能因材施教,周恩来兄弟的学业也有了长足进步。在陈家花园塾馆,周恩来不仅文化知识有很大的长进,还苦练了自己的书法。据当年周恩来在陈家花园塾馆同学也是舅表妹妹万怀芝笔录(周恩来故居收藏)上说:“我当时还在写描红大字时,七哥(指周恩来)就能悬肘写字了。”“描红”是旧时蒙学馆教孩子学习毛笔字的一种办法,即把字形笔划用红线印在作业本子上,学生拿着笔在红线框内照着字形描写,所以叫“描红”。

然而,周恩来一家在陈家花园生活、学习了不久,他的母亲因操劳过度,加之中奖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她经常焦虑,终于忧劳成疾,一病不起。万氏得的是那时还治不好的绝症:肺结核!因为万氏出生于官宦之家,生性好强,竟然在生了重病后还强打精神,说自己没病,以致又延宕医治,不幸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天去世了。她的丈夫、周恩来生父因在外地谋生,竟未能赶回来与妻子见最后一面。因为周恩来

外婆万张氏对丧葬提出了过高过严的要求,导致周贻能根本无法安葬其妻,只好把万氏灵柩暂厝在一座尼姑庵中。这一厝就是28年,一直到1935年,周贻能才将其妻灵柩从清江浦水运到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夏庄周家祖茔地。周恩来对这件事是刻骨铭心的,这在他的留日日记中是有明确记述的。

宝应水巷口陈家

周恩来生母万氏的辞世对周贻能、周贻淦这两房头的打击太大了。周贻能生性忠诚厚道。他连师爷也未学上,只能做一些政府机关的抄写收发之类的小职员,或者当家塾馆老师等挣钱不多的事情,收入微薄到无法养家活口。周恩来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为子之后不久,小叔父就去世了。按封建礼俗,嗣母陈氏不能改嫁,也不能外出“抛头露面”。他们的生活费用哪来呢?他们是在发了财(中彩)离开驸马巷周家的,现在好回淮安吗?因此,万氏一离世,陈氏就拉着周恩来的手悲恸地说:“儿子,我也活不长了。”原因是她的丈夫周贻淦是肺结核病故的,嫂嫂万氏也是肺结核病去世的,由于朝夕相处,她也染上了这一当时的绝症,再加之生活的艰辛,她哪能健康长寿呢!

陈氏妈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向儿子周恩来提出:回一趟宝应娘家。一是让懂医术的侄儿陈式周看看病,二是散散心并安排后事。就这样,陈氏和周恩来母子俩登上了里运河顺流而下的木帆船来到了宝应水巷口3号陈氏的娘家。

陈氏的侄儿名陈捷,字式周,号逸石,后以字行。他毕业于通州(今南通)师范,知识渊博,后来曾当过上海《申报》编辑,还做过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教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国文。他只比他的三姑(周恩来嗣母陈氏)小5岁,比他的小表弟周恩来大16岁。因为陈式周小时候曾在淮安周家塾馆寄读过,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很欢迎,也很高兴。

陈氏妈妈十分关心儿子周恩来的学业,一到娘家就向侄儿陈式周提出,让周恩来到陈家塾馆读书学习。陈式周经与周恩来亲切交谈后,发觉他的这位只有十岁的弟弟,竟能评述古代的诸子百家直到清朝的“洪杨之乱(太平天国



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是洪秀全、杨秀清)”，而且都有他与别人不同的独到见解。这使见多识广的陈式周大为惊讶，他就对三姑说：“我们家的塾馆只能教授那些蒙童孩子，大鸾(周恩来)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就不要再上蒙馆了，就让他到我家的书房读我的藏书吧。”因此，客观地说，周恩来在宝应不是上学读书，而是到表哥书房看书学习，表哥陈式周适当给他一些辅导、指点。

陈氏在宝应娘家一共只呆了三个余月，周恩来也就一直在陈家书房读书三个多月。他后来回忆说，在陈家书房读过《西厢记》《醒世恒言》《施公案》等书，使他眼界大开。可惜的是陈氏妈妈病体日渐沉重，母子俩只好登舟北返，重回清江浦陈家花园。

龚家塾馆

嗣母陈氏回清江浦不久便告别了人间。十岁的周恩来在处理完嗣母的丧事后只好带着两个更幼小的弟弟返回淮安驸马巷。

这时的淮安驸马巷周家更加败落了，稍微灵活一点的男丁均已外出谋差做事去了。周家院内住着几代孤苦伶仃的老人：周恩来二祖父周昂骏的遗妾亚老太、周恩来二伯父周毓鼎的元配痴二奶奶等。只有近乎瘫痪的八叔周貽奎和八婶还“坚守”着这个家。因此，周家塾馆虽还存在，但已付不出学关钱。教书先生倒是忠诚老实，每过三五天还能来学馆摇铃上一堂课。但那只不过是客串一下装装门面而已。

在从清江浦返回淮安的那段时间内，周恩来除了按旧俗在母亲灵前守孝和读书之外，还

曾到已裁撤的漕运总督大门外的石狮子处学下象棋。在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的一份周恩来堂弟周恩灿一份笔录上说，“七哥在为他母亲守孝时，还在油灯下看书。”

酷爱读书的周恩来不愿就此荒废自己的学业。他求请八婶杨氏去住在淮安城里东岳庙附近的龚家，希望能让他到龚家塾馆寄读。

杨氏迈着小脚，带着恩来、恩溥、恩硕和恩寿兄弟四个一起来到龚家。经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亲自面试、考核，只留下周恩来一个人在龚家塾馆寄读。就这样，龚家塾馆成了周恩来在老家淮安的最后一个读书的地方。

龚荫荪是常州人，字天枢，他的妈妈是山东人袁状元的女儿，也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亲姨母。龚荫荪还是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因此，周恩来在龚家塾馆寄读的日子里，曾在龚家书房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和《中华时报》等进步书报。而且，龚家塾馆的周先生又能因材施教。周恩来在入龚家塾馆前就已经遵照《家训》练得一手健硕的颜体毛笔字。到龚家塾馆后，周先生又要求他在颜体的基础上加练魏碑，以增加他笔锋的刚阳之气，终于形成周恩来后来那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1952年秋天，周恩来视察上海，在霞飞路自己的临时寓所会见姨表姐龚志如时还说，“表舅(指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教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教师。”可见周恩来对在龚家寄读是留有深刻记忆和印象的，也是他自己十分看好的一段岁月。

然而，天不遂人愿，周恩来在龚家只寄读了一年时间，由于龚荫荪是位革命党人，他的行踪早就被清廷的地方爪牙盯上了。清宣统二年(1909)春节，清政府对龚府实施抄家、扫地出门，所幸未能抓到龚荫荪本人。这样，周恩来失去了他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处“天堂”，只能向在东北的四伯父(周恩来的嫡亲大伯，大排行四)求助，“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啊！”

在四伯父周貽赓的疼爱关心下，周恩来走出了淮安驸马巷，迈出了他那波澜壮阔人生的大步伐！

(作者系周恩来纪念馆副研究员)

潘德輿·丁晏·王锡祺

——清代淮安三位学者

■ / 胡 健

淮安历史上最有名的学者当推考据学大师阎若璩与甲骨学开山始祖罗振玉。此外,潘德輿的诗学理论、丁晏的经学研究与王锡祺的輿地丛书的编辑,在学术史上也都有一定影响。

一、潘德輿的诗学理论

潘德輿(1785-1839),字彦辅,号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世家。道光八年(1828)举人,安徽侯补知县。著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养一斋诗话》十三卷。他的《养一斋诗话》,在嘉庆、道光年间的诗坛上,不论是诗学观,还是对古代诗歌的评鹭,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其篇幅的宏富,在中国古代诗话中也是少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名家郭绍虞先生称《养一斋诗话》为“严肃认真”的诗话,并将其选入《清诗话续编》。

潘德輿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言志”与“无邪”的诗教观。潘德輿在论诗时,对儒家的诗学传统是主动地继承的。《养一斋诗话》中明确地说:“‘诗言志’与‘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诗言志”与“思无邪”都是儒家论诗的基本主张,潘德輿在他的那个时代,强调这二者,并把它们视作诗之根本。潘德輿在论“诗言志”时,对传统的情理统一是有继承的,但他在论“诗言志”时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更多地把“言志”与“自得”结合起来,所谓“言志者必自得”,“言志”而“自得”,即“本之于性天,养之以经籍”,“深造自得,居要资深”。意谓诗作除了要有打动人的真诚情感外,其内容还须有作者的志趣与抱负。关于“思无邪”,潘德輿在《养一斋诗话》中说:“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思无邪”是说创作动机要纯正,不

要为迎合庸众去创作。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诗歌才能真正有补于世,有益于教化。在潘德輿看来,“诗言志”与“思无邪”不仅是作诗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衡量诗歌美丑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诗之美恶不得遁矣”。

2. “厚”与“质实”的本体论。潘德輿在《养一斋集》的卷首,还标举“厚”为诗歌境界的本体:“诗只一字诀,曰厚。偶咏唐朝人‘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征鸿问消息,居延城外又移军’,便觉其深曲有味。今人则说到梦见关塞托鸿问消息便了,所以为公共之言,而寡薄不成文。”潘德輿所说的“厚”,是指诗的境界要“深曲有味”,这样的境界才能给人以真正的诗歌的美。潘德輿所强调的“厚”,显然是针对当时“性灵派”末流诗的内容轻薄而立论的。潘德輿认为,诗歌抒发的思想情感必须是深厚的,有社会意义的,这才能谈得上“厚”。他指出:“真则厚,不真则不厚。”而诗境之“厚”主要来源于诗人高尚的真情。他在强调诗境贵“厚”的同时,还提出了“诗境全贵质实”的主张。他认为“质实”与“厚”密切相关,但又有区别。“厚”主要是就诗歌境界的本体特点而言的,“质实”则是就诗歌内容的坚实与诗歌形式的质朴而言的,诗歌“质实”了,诗境才能“厚”。潘德輿对诗歌境界“厚”与“质实”的重视,与他的诗教观是完全相一致的。

3. 重视“胸襟”的主体论。潘德輿论诗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十分强调诗人的主体性。他认为:“文章之道传真不传伪,亦观其胸次、行止为何。”他还认为:“胸襟大一分,诗进一分。”这也就是说,诗人本身的素质与修养对诗歌的品



级与格调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的。潘德輿论诗重“诗”，更重“诗外”，重诗外的人的“胸襟”。从《养一斋诗话》的具体论述看，他所说的“胸襟”，主要是指诗人的“学问”与“性情”，即诗人的主体性。他将曹植、陶渊明、杜甫称为两汉以后的“诗圣”，作此评价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其主体性出发的。潘德輿对诗人“胸襟”与“诗”的关系的强调，同样也与他重视诗教的诗学观是分不开的，因为在他看来，诗歌的根本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

综上所述，潘德輿的诗学观是以“美天下之风俗”为论诗的宗旨的，他对诗歌本体“厚”与“质实”的重视、对主体“胸襟”与“诗”的关系的重视，显然是对儒家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潘德輿的《诗话》在浩瀚的“诗话之林”中独树一帜，近代论诗者如刘熙载、梁启超、周实的诗学观点，都受到潘氏的影响。潘德輿一生治学，他对古文、诗、词、赋以至小说《红楼梦》研究均有很深的造诣，在经学、哲学研究方面亦堪称专家。作为清代著名的诗人、诗学批评家，其诗文著述在清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二、丁晏的经学研究

丁晏(1794-1875)，江苏山阳(今淮安区)人，字俭卿，号柘堂，是清后期著名的经学家，有“江淮经师”之称。丁晏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儒生家庭。其八世祖丁国信，原籍山东济南，于明万历年间，“因贩布帛来淮贸易，遂占籍山阳”，自高祖辈起开始走读书求仕之路，“世丰腴、累叶忠厚，读书敦善行，朴然有古风。”其父琮(1754-1807)，字锦舒，号礼崖，邑附监生。“性沕穆，无机心，朴讷寡言，交友以信”，“亲串中窶贫者，恒周恤之。”丁晏上辈虽累世读书，然无一求得一官半职，其家境十分贫寒。丁晏“少聪颖，多疾病”，爱学习，很勤奋，然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他是道光元年(1821)举人，后官至内阁中书。晚年主讲于丽正书院。咸丰十年(1860)，因平定捻军有功，被赏戴花翎。同治三年(1864)，漕督吴元炳又奏保“赏二品封典，诰授通奉大夫”。同治十年(1871)与何绍基一起主持《重修山阳县志》与《淮安艺文志》的修纂，光绪元年(1875)病逝，享年82岁。

1. 遍释群经的研究领域

丁晏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著书，至老不衰。他24岁时就完成《论语孔注证伪》，并受到前辈学者的重视与好评。他中举后，仅得教职，治学严谨，著作浩帙，著书47种，有“当世之冠”之誉。丁晏在《柘翁七十自叙》中写道，“四十以前训诂考索，六句以后，义理研求，《易》《传》成于晚年。”

丁晏的主要经学著作有：《论语孔注证伪》《毛郑诗释》《郑氏诗谱考正》《周礼释注》《史记毛本正误》《周易讼卦浅说》《尚书余论》《禹贡集释》《禹贡锥指正误》《易经象类》《左传杜解补正》《春秋胡传申正》《孝经征文》等，这些著作大都收入他的《颐志斋丛书》。他的经学研究领域很开阔，可谓遍释群经。这其中又以以下三方面更有影响：一是《尚书》研究。丁晏继阎若璩后研究《尚书》，在《尚书余论》中，进一步论断了《古文尚书》及《孔传》为王肃的伪作。二是《禹贡》研究。他辑《禹贡集释》，匡正了胡渭《禹贡锥指》中的许多错误之处，是对《禹贡》研究的拓展。三是郑学研究。郑玄(127~200)，字康成，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成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丁晏笃好郑学，于《诗笺》《礼注》研究尤深，而认为孔颖达疏多失郑旨。他不但撰有《毛郑诗释》《郑氏诗谱考正》《诗考补注》《补遗》《三礼释注》，还辑有《汉郑君年谱》。

2. 汉宋兼顾的研究方法

经学是中国儒家典籍的尊称，由于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不同，历来的儒家学者对经书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丁晏的经学研究受汉代郑康成的影响很大。郑康成在两汉经学中，就有调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特点，而处在清代中后期的丁晏，在经学研究时则又能兼容汉学与宋学，他认为汉儒重训诂，宋儒重义理，二者不必对立，也不可偏废，因而要两者兼顾，他的观点是比较通达的。这样，丁晏治经学就跳出汉学宋学的窠臼。“晏治经学不掎击宋儒，尝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正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汉宋兼顾而不必偏废，这可以

说是丁晏经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色。

3. 诗学领域的重要成果

丁晏既是学者又是诗人,他著有《颐志斋诗草》。在诗学领域也有自己的学术拓展,《曹集铨评》就是他在古典诗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专著,此书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曹植是我国中古建安时代成就卓越的文学家,他的词赋为六朝、隋唐的文学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陈思王曹植集》,在唐宋时的刊本较为精密,到南宋因社会动荡、国力衰弱,刊本大逊色于此,文字亦多误。而明代虽有刻本,但明人刻书,不按宋代旧式,文字亦多加臆改。丁晏是曹诗的钟爱者,他不满此状况,决心搞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曹诗本子。他根据旧本及散见于各史书、总集中的曹植作品,进行检校,铨评,于同治四年(1865),完成了《曹集铨评》,颇受时人好评。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植集校注》,就是根据丁晏的著作为蓝本整理的,校注者赵幼文称,丁晏的《曹集铨评》“矜慎详密,号称善本”。

此外,丁晏还编纂有《山阳诗征》。

三、王锡祺的舆地著作汇编

王锡祺(1855-1913),淮安清河人,字寿萱,号瘦髯。王锡祺的祖父以盐商发家,父亲为举人,家庭比较富裕。王锡祺18岁时考中秀才,后“九应省试不中”,又“磊落自烹,不事生产”,便以治学为乐。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研究经、史、古文、诗等。又从光绪三年(1877)起,转为研究舆地、洋务、时政。在亲友的帮助下,经十五年努力,收集舆地游览书稿数千种,于光绪十七年(1891)编成《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后“续有所获,仍逐次增入”,于光绪二十年(1894)辑成《补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辑成《再补编》,三书均由上海著易堂排印出版。《三补编》稿本,后在大连图书馆被发现。这部丛书共收书1348种,其中译著1026种。王锡祺晚年生活潦倒,“落魄以终”。

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强烈的用世之志和警世意识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从初编、补编、再补

编以至三补编的编撰出版之际,正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后。许多有识之士,在国难当头之际,期望了解世界形势,力图变法改革,以挽救灾难沉重的中华民族。而王锡祺一则生性喜好舆地之书,对舆地学亦有着渊博的知识与精深的造诣。他撰写了大量的史地著作,其中收进《丛钞》的就有《巴马纪略》《坎巨提帕米尔疏略》《中俄交界记》《台湾近世末议》《西藏建行省议》《方舆诸山考》《武当山记》《北行日记》《暹罗日记》《登燕子矶记》《都鲁金矿疏略》《中英续议滇缅界务汇录》等近二十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王锡祺对“异族叩关”十分警觉,他在《再补编》序中说:“中日构器,全局一变。然台湾虽割弃,而辽东犹戴我王灵。及此上下交傲,力图振兴,谓非千载一时欤?”作者直陈中国国土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酷现实,他欲通过此类典籍的刊布,帮助世人了解世界大势,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实现“力图振兴”国家的美好愿望。他在编《三补编》时,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识。他在序中说:“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贾耽曰:‘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中国隶亚州若何?中国不之知,而日本知之,而欧美各国知之。日本欧美各国若何?同治以来始稍稍有缀旧简,采象胥,开辟蹊径者。然非洲澳洲则仍瞢然忽然也。”他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对清王朝闭关自守,在外交上不能应国际潮流而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他以“时事砧危,创四千年之变局”警醒人们,中华民族到了危亡关头。呼唤人们振作起来,审时度势,了解天下大势,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以挽救危亡中的国家,这就是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补编》的目的。他十分向往清初“东服诸部、北犁蒙古、西戡卫藏、南辑緬暹”的强盛,怀念“乾嘉以降,海宇承平”的盛世,所以他编辑《丛钞》是有着唤醒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现实用心的。他以传播世界舆地知识为己任,穷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财力,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巨著,反映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2. 收集广博,资料宏富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是清代末年极为重要

的輿地著作汇编,著名文献学家吴丰培先生认为,它是輿地丛书中的空前之作:国外则当时各国的行政,輿地的概略,以及輶轩使者所录;国内也博采旧籍,凡游记及地域亲记均加搜辑,特别是关于边疆地区,虽有经见之篇,也备罕见之文。更于《补编》《再补编》中多辑秘笈,其中游记一类,遍及各省,犹为难得。

(1)关于自然地理的知识。如《地球总论》《地理述略》《五洲方域考》等35篇。其中,既有外国人所撰,也有中国人的所撰。

(2)关于世界地理。有各大洲总论:《五洲方域考》《欧洲总论》《亚细亚说略》等,也有专论:《地理形势考》《五大洲輿地户口物产表》等;有各洲诸国和地区的地理考辨的专论:《暹罗考略》《高丽水道考》《南极新地辨》等;有志略:《中外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越南志》等;也有游记,如《东游纪略》《航海述奇》《初使泰西记》等;还有日记,如《使德日记》《欧游随笔》《漫游随录》等,这部分共收书稿287种。

(3)关于中国地理。这方面收录种类最多,有中国地理总论,如《中国方域考》《方輿纪要简览》《天下形势考》等;也有论述全国某项地理内容的专论,如《府厅州县异名录》《中国历代都邑考》《中国物产考》等;有关于各省地理的总论,如《直隶考略》《江苏考略》《广西考略》等;也有论述省境某项地理内容的专论,如《东蒙古形势考》《回疆风土记》《山东诸水编》等。此部分共收各类书稿1026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发现的《小方壶斋輿地丛钞三补编》(稿本),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此编共收录文献96种,分为十二帙。与前三编相较,在选材上更加精审,尤其注重边疆及沿海地理文献的收录,如“东三省边防答问”“图们江口宜划归中国议”“藏印边务录”“中俄交涉考”“越南风俗记”“腾越近边关隘考”“澎台海道图说”等,其中不少著作作为稀见的珍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3. 分类明析,便于检用

《丛钞》作为一部宏大的輿地丛书,王锡祺“首辑总论,继以各说”“以华夏始,以外洋终”“行程记录,祇搜本朝”。他在《初编》中有曾记

述:第一帙,“扈从殊恩,发祥重地”;第二帙,“柿附懿亲,爪牙狂寇”;第三帙,“西控强藩,北联劲敌”;第四帙,“岳渎奥区,山川胜境”;第五帙,“迁客骚人,他乡异县”;第六帙,“腹地膏庾,岩疆牙错”;第七帙,“川粤冲烦,滇黔要害”;第八帙,“边陲告谧,丑类相安”;第九帙,“海天万里,属邑千余”;第十帙,“邻藩星拱,洲岛云罗”;第十一帙,“荣戟遄临,共球斯受”;第十二帙,“斐互一洲,墨区两界”。后三编:《补编》《再补编》《三补编》分类、体例一贯前例,各编12帙。

《丛钞》的资料来源,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专书与地志。如《丛钞》第一帙的《地球志略》摘录于《瀛环志略》卷一《地球》;《丛钞》第二帙的《绥服内蒙古记》,摘录于《圣武记》,等等。

(2)清人文集。如《丛钞》第四帙的《登泰山记》取材于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十四;《登南岳记》取材于唐仲冕《陶山文录》卷七;《游庐山记》取材于洪亮吉《更生斋乙集》卷八,等等。

(3)各种传抄本与稿本。如杨宾的《柳边纪略》、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博明的《凤城琐录》,等等。

(4)现今已不知所本的各种文献。《丛钞》对以上材料汇编时,基本原书照录,偶尔也有个别字句的改动。对所编资料未注明来源和出处,并删去原书的序跋和凡例,这是此丛书的一个欠缺。

综上所述,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是清朝末年有关地理丛书的巨制,它是由初编、补编、再补编构成的一个系统工程,《丛钞》收书一千余种,近一千万字,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锡祺还曾选编淮安本地人著作数十种,重编了道光间邑人丁晏《山阳诗征》24卷为36卷,自己续编《山阳诗征》44卷,一起印行,合称为《小方壶斋丛书》。《小方壶斋丛书》现今仍为学术界所重,它是研究淮安地方史的重要资料。

(作者系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韦恂的教育人生



■ / 於剑山

韦恂,原名乃坤,别号捧丹,笔名普天,1896年9月15日出生于香山县翠微村人和里(今属广东省珠海市)。翠微村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早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建起了凤池书院,加之此地毗邻澳门,近代以来商业贸易发达,对外交流频繁,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如吴健彰、吴其藻、韦东暄、杨屏、郭以治、韦卓民等。韦恂之父韦樵菽,是当地一位有名的中医。韦恂在家乡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成长,6岁入私塾读书。1905年入广州南武学堂(南武中学)附设二等小学。南武学堂校长何剑吴(1876—1939),名锷,字永业,号剑吴,广东番禺人,同盟会会员,是著名教育家、我国体育教育的先驱。年轻的韦恂在他影响下,与同学创办校刊《嚶求集》,以笔名普天发表文章,宣传反清与革命,加入了同盟会,并在全校学生中第一个把辫子剪掉。1911年10月底,李沛基在广州炸死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年仅15岁的韦恂因参与这一行动,遭到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的通缉追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通过广东都督胡汉民拟定派遣韦恂等三名青年赴英国留学,因“二次革命”,韦恂积极参加讨袁斗争,未能成行。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韦恂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赴英国。先入代耳学校补习英文及物理、数学等。1915年2月,韦恂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入学资格,选学机械工程。因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对德宣战,于1915年夏,转入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继续



韦恂照片

修习机械工程课程,后改学社会科学,1918年6月获文学学士学位。191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研究政治及社会学,1920年冬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韦恂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被选为中国留学生中部分会会长和芝加哥中国学生会会长,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中文季刊、英文月刊编辑。同时,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与文字改革问题,曾于1919年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改良中国文字意见书》一文。指出我国文字存在的先天不足,对于发展文化、普及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他主张使用拼音文字,推广白话文。《留美学生季报》在“记者按”中称韦恂“于世界语曾有研究,并精通欧洲各国语言之拼音法,曾以试验所得,著成英文长论,

题为《中国字音实验论》。”^①

1921年1月,韦恂学成归国,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讲授哲学、政治学,并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心理学、教育哲学。同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委任韦恂为秘书兼革命政府外交部秘书。8月,受孙中山委派作为革命政府代表,出席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教育会议,当时出席这一会议的中国代表还有蔡元培等五人。1922年1月,韦恂曾协助苏兆征到香港与港英当局交涉,迫使港英当局接受罢工海员的要求,使大罢工获得胜利。1923年3月,孙中山平息陈炯明叛乱,重返广州设大本营,韦恂负责外交工作,并代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该委员会取消后,任广州市政府参事,仍在岭南大学兼课。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国共第一次合作。韦恂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胡志明等,并曾与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畅谈中国革命与农民运动等问题。受毛泽东启发,并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廖仲恺的帮助下,韦恂曾一度回故乡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6月,韦恂在苏兆征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未履行正式入党手续。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韦恂任外交部秘书兼国际司司长,兼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1926年11月,随国民政府从广州前往武汉。此后,韦恂往返南昌、武汉之间,忙于收回九江、汉口租界等外交事务和教育事务。同时,他还兼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同年,出版了《中国文化之回顾与前瞻》。1927年春,韦恂起草了《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并经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讨论通过。这一草案于同年7月1日在上海各报刊发表,这一草案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提出了“党化教育”的方针。草案提出:“国民党不是一个平常的政党,他要把

旧的政治组织推翻而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系统,而且他所代表的利益是民众的利益而非特殊阶级的利益。是革命党和代表民众利益的党。”“我们所谓党化,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②这一草案除强调革命化和民众化外,还强调科学化和社会化。其主要内容中有关于民众教育、义务教育、生活教育、军事训练、体育训练、科学教育等内容,在当时的背景下都是相当先进的。但由于党化教育这一提法政治意味太过露骨,在社会上及国民党内均受到反对,不久之后便被三民主义教育所取代。

“四·一二”后,韦恂避居上海。1927年6月,又远赴加拿大温哥华。在国外期间,韦恂考察教育制度,搜集教育资料,并多次参加教育与政治学术会议,又与美国、法国政界、学界人士会晤,讨论中国大革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并应邀赴英国伦敦大学、利物浦大学、牛津大学讲学。

1928年,韦恂再次回国,经蔡元培推荐,担任上海教育局局长。在教育局长任职期间,他提倡白话公文及“行验教学法”,举办民众茶园,职业学校,并出版《上海教育》阐述他的教育主张。1929年9月起,赴南京任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委员、教育行政组主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普通教育处处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930年7月,任上海青年会中学校长,并在复旦、光华、暨南、大夏等大学兼任课程。1932年夏至1938年7月,应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之邀,任该馆编审部主任。1936年,发表《中日问题的管见》《目前维护中国统一的基本政策》等文章,主张联苏抗日,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

① 韦恂《改良中国文字意见书》,《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八年(1919),秋季第三号。转引自陈达颖《留美学生季报》与五四文学革命》,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韦恂《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载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8-17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6册,上海书店,1989年。





1964年至1970年任华侨大学代理校长时,与师生合影的韦恂(前排中)

发,韦恂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1月,上海沦陷,他撤到租界坚持抗日宣传,出任上海《译报》总经理,又创办《上海周报》,任总编辑,并组织参与多个爱国社团,争取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2年12月,至新四军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受任为新创办的江淮大学校长。1943年,经陈毅、张云逸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公开身份。韦恂在主持江淮大学期间,提出以“劳动、学习,为人民谋福利”为校训,培养了一批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淮阴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韦恂任第三副主席。其间曾一度参加华东解放区的军调部,并至北平军调部协助中共代表宣传“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1946年,苏皖边区政府机关北撤后,韦恂随军从淮阴转移山东沂蒙山区和胶东地区。1947年,又转移至大连。1948年夏,在山东潍县筹办华东大学,被任命为校长。1949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任副市长兼高等教育处处长。

1949年9月,任“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

大会”筹委会主席团成员、常务委员,并作为华东解放区代表出席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至1964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1951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兼任《中国语文》杂志社社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52年秋,任中国文化教育考察团团长,率团前往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访问。1956年,中央决定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韦恂为委员。1964年4月至1970年1月,任华侨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1976年11月25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病逝,终年80岁。

(作者系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资料科科长)

清朝巨商“程震泰”经商和持家之道

■ / 程翼云

程良策，字嘉谋，晋代新安太守程元谭之后，清代徽州府（今安徽省黄山市）人。“震泰”是他后人程开聚的商号名，久之人便呼之“陈震泰”。程良策无意宦途，继承徽商传统，在商业上发展，于各地经销徽州土特产品，发现江苏清江浦是一个很大的水陆码头，有九省通衢之称，京杭大运河横穿东西，市场十分繁荣，是经商的好去处。他便从徽州府歙县迁居清江浦，先以织布为主，当时正值康熙进入盛世，生意兴隆，经营收入颇丰，陆续在清江浦购置房产，安家立业。沭人耆老有词咏颂：“自幼离家习贾，长成独立经营，清江浦上露声名，家道小康初定。”“子贡陶朱瞠目，街坊邻里更惊，暗中翘指赞雏鹰，佩服才能天性。”

程良策娶灵山方氏，生三子，长子名正美，次子名正焜，三子名正煜，相继与清江浦灵山方氏、岭后吴氏家族联姻，生意盛极一时。同时他发现临近清江浦的沭阳县，由于连年灾荒，棉布、棉花等甚缺，是一大商机。沭阳属淮安府管辖，两地早就互通有无，他便到沭阳县城设摊点，奔走于清江浦与沭阳之间，并进一步在沭阳发展，增设店铺，扩大经营，购建房产，生意逐渐由清江浦开始转移到沭阳。先由正美迁往沭阳居住，正焜、正煜以后亦陆续迁沭，家道逐渐殷实。其时，年长者经商求利，年幼者读书求学。子孙中有的为太学生，传至程开聚。

程开聚壮年时，由于严重的水灾，地震灾害，房产被毁，田地无收，家道中落。他身贫志不贫，决心继承徽商传统，立志重新振兴家业。他说：“古人云：有志忠于道德，功名不足论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他本属“玉”字班

辈，他打破常规，起名“开聚”，以开始聚财。据《沭阳县志》和《程氏宗谱》记载：“他少有至行，长而弥笃，明敏尤极，喜读书，通史籍，壮年以家贫弃儒就贾，勤俭起家，不惜尘劳，先以城市织布至乡镇售之……”资本逐渐充盈，遂于沭阳东门外受一廛（堆放货物的地）。大开商肆，并在城乡设立店铺，同时在海州、赣榆、钱集、胡集等城镇设立行栈，中转和扩大经营，增加经营品种、门类，开设油坊、酒坊、粮行、当铺、钱庄等场坊。并对商店逐一命名，他认为在地震及水旱灾害以后，否极泰来，便皆以泰字开头为店号，取三阳开泰之意，将最早最大开设的布店，便命名为“震泰”，店铺多达二十五间，其他名为“和泰”“盛泰”等店共十八间（pán）。对场坊多以恒字开头，有恒盛等字号，取永恒之意，共有九家，故号称“九恒十八泰”。遍布沭城东关大街及乡镇，对沭阳城镇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资本日益增加，多达百余万。同时陆续在农村购得土地一千六百余顷，纵横二百余里。另外，他认为海州是盐的产区，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成本低、产量大、销路广、利润多，也是一大商机。于是始经营盐场，在海州板浦拥有盐池数千号，将盐运销各地，运回需要的商品，一举两得。陆续又在沭阳建立住宅千余间。光绪年间，其财产居全国巨商第三位，为淮北首富。

程开聚发家致富，成为巨商，主要经验是：

一、以德为本。他自幼即聪明好学，通读史籍，手不释卷，求学不懈。深受儒家、佛家影响和程颐、程颢哲学思想的教诲，他铭记祖训：“在天为命，在人为性”。“义礼知性皆仁也”，“有德矣，动无不利，为无不成。”“自谋不诚，则欺心而

欺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自怨。”（语出《二程全书》）。所以他经商处处以仁义道德为本，立德、立言、立行。乐善好施，爱国爱公爱民，对国家有难，捐助大量钱财；对地方公益事业，慷慨解囊；邑中发生灾害，对灾民救粮救衣。因此，几次获得皇帝诰封，子孙亦多获官府的旌表、加衔、赠顶戴。其父程仲璜诰封一品衔，皆以功德而受禄，以善举而载誉。

二、以德为商。他在经商中，始终本着“君子敛财，取之有道。”初期由城市贸布至乡镇售货，稍有盈余，仅够糊口，但遇人有急难，不惜尽其所有以资助。他铭记古训：“与人为善暖于布帛。”“与其浊富，宁此洁贫。”因此，他一向公平交易，老少无欺，深得邑人信赖。他的酒坊所产的酒都是按质论价，分等级定价，绝不以次充好。有一次外地来购优质酒，最后缺一缸，店员便将次质酒补上。程开聚知道后，立即令人把次质酒追回，并赔礼道歉，深得邑人赞扬，更提高了信誉。同时由于薄利多销，商品的销量大增，资本日益增多。但就近城市进货，数量有限，供不应求，尤其是丰收年份，人们急需添置衣物、布匹、棉花等，供应十分紧缺。为了开辟货源，他便到江南及南通等产地进货，但路途较远，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一般商人不愿涉足，他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他不畏劳苦，远道前往选购，日夜兼程，通过水陆两运，有的要经过海上运输，运达沭阳等地出售。正如昔人所说：“商旅不行，利润难行。”由于货源充足，价廉物美，邑人称之为“过海布”，结实耐穿，争相购买，销量大增，不但调剂了供求，而且获利渐增，资本更加雄厚。

在丰收年份，农民急需出售余粮购买棉布、棉花等日用品，致粮价大跌，他看到谷贱伤农，便以正常年份粮食价格收购。邑人不解，对他说：“你为何不按市场最低价收购，可多获利。”他说：“沭阳水旱灾害多，几乎十年九年荒，我现在收粮价格虽然高一点，农民便愿把粮食到我这里出售。他们收入就可多一些，他们不吃亏，我也能多积粮食。如果来年荒年，粮价必然大涨，我以平价出货，仍可获利。对于无钱无粮的，我仓内有粮，可开仓放粮，救济灾民。”

程开聚在经商中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善于用人。古人云：“与其多得数万缗，何如得一贤才。”“人之所助者，信也。”“人心所归，惟信与义。”据《程氏族谱》载：“公所招与同事者皆诚实可托万金，公与之同甘苦，推心腹，使人乐尽其力。”他经商另一特点，是重于调查，深入研究，掌握信息。那时交通不便，信息很不灵通。据《程氏族谱》载：他择同事中之精明谄练者常住江南产布等地区，随时掌握产地的价格情况，以审时度价，掌握价格高低，精选广择，价廉物美，及时进货。由于同事者尽心尽力相助，获利日益增多。沭人耆老曾作词赞誉：“传承祖训专卖布，劳碌奔波，扑面风霜苦，饥寒交迫自可御，更怜冻馁邻家奴。慷慨解囊行善举，积德冥冥，寄望儿生富，父老乡亲亲目睹，邑中有口声声誉。”

三、以德为怀。他常说：“古人告诫我们，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有财无义，恒家之殃。”因此，他致富不忘乡里。据《程氏族谱》载：“邑中善举，无不乐输，然输款皆不署名，仅书曰无名氏，或问其故，公曰：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行阴德事岂为名哉。”故公所捐，鲜为人知。道光二十一年，英国人攻打镇江时，国库空虚，筹饷甚急，公慨然捐赠二十万金。朝廷奖给二品顶戴，建立宗祠，置祭祀产业，所费百万。因其功绩大，善举多，公由太学生加布政司理事，屡邀封典，诰授奉政大夫，晋封资政大夫，钦命头等顶戴。

他不仅为国捐资，对乡里公益事业亦多善举。道光十三年，沭阳大灾，他捐金五千两，并开仓施粥，救活人命无数。州牧王用宾详情上宪，朝廷奖给“闾里矜式”匾额。

由于灾荒频仍，田地往往颗粒无收，很多农民急需用钱，将土地以低价出售，仍无人购买。程开聚按正常年份的土地价格购进，并仍由售田者耕种，按交纳租粮最低分成数量交粮。歉收年份按歉收程度减收农民应交的租粮，荒年则免收，并开仓放粮。

在佃户交粮时，粮斗上均刻有“敦礼堂”“敦德堂”等字样，规定验收人一定要做到斗量要推平，秤称要称平，不能让农夫吃亏。他常说：“我今收粮易，农夫种田难。”深得佃户的信赖。邑

人有谚云：“种田要种震泰的田，买布要买震泰的布。”

四、以德传家。他立的家规甚严，处处以道德自律，他常引用古人的话说：“我有德于人，无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在班辈排行用字，列有“德、懋、家、方、泰、才、兴、世、益、长。”使子孙以名自律。他虽田地多，粮满仓，但他深知仓中有粮，人心不慌，要珍惜粮食。他要求子孙熟读铭记唐朝李绅《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尤重于学，要求子孙，不但要读圣贤书，而且要铭记祖先程颐、程颢的祖训。他说：“宋时学者杨时能做到‘程门立雪’而求教，我们更应铭记祖训以立身。”祖训云：“学必激昂自进，不至于成德不敢安也。”（出自《二程粹言·论学篇》）。他以身作则，邑人曾流传他以德为怀的一段佳话。那时社会制度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他德配夫人汪氏，终身未孕，为了继承祖业，劝他另娶侧室，她托友为他觅之。据程氏沭阳《程氏族谱》载：友人至南方觅得一黄家有女待嫁。初见时，貌甚美，与其母约定时间送女登舟，但送来时，则为貌寝者，细诘之，乃其妹也，遂弗受。女哀之云：“姑携之归，如终不肯受，则仍易其姊。”友颀之，及至家。遂以实告，听公自以为计。公曰：“吾虽欲娶美者，奈此人已至吾家，若再令女去，另适他人，心生疑义，谁肯娶之，则误女终身矣。”便留了下来，邑人传为美谈。

黄氏夫人，生四子三女，长子少亡，次子名立焯，三子名立炜，四子名立炘。程开聚坚持以德治家，教子甚严，虽然生于富家，绝无纨绔气习。

次子立焯好读书，敦厚精炼，出仕后，由部铨选湖北郟阳府同知，期年调湖北省房县知县。有政绩，慎官箴，清正廉洁，严禁差役勒索，以宽简治民，催科不扰，百姓感其惠。上宪贤之，旋升郟阳府同知二品封典，后以事亲告养，家居二十余年。所居曰“退省轩”，仍力行节俭，而于公益事业，毫不吝嗇……诰封中议大夫，后诰封荣禄大夫。

三子立炜，幼颖异美，丰仪舞象，少时文字，已有可观，授业师皆当时名士，应童试，州录冠

军，游泮后旋以岁试优等……道光二十二年以海疆不靖，报效军需一万五千两，奏奖议叙加道衔，并赏给“克襄王事”匾额。漕督吴勤惠公饷不足，公知之，捐板浦盐池二百号，以筹资御敌。奉旨赏赐花翎三品衔，后为郎中，签分刑部山东司行走，供职五年，于庶狱多所平反，爰承先志，仿范文正公遗德，捐建义庄，田二十余顷，以贍宗族，又立义学，以课族中子弟，邑人甚感其盛德。联名申请旌表，奏奉特旨建坊。诰授奉议大夫，升奉政大夫。

四子立炘，为人精明强干，气宇轩昂，有胆识，智虑过人。继承先业，守而兼创，又增积数百万金。初由太学生加捐兵马使指挥员外郎。咸丰三年土匪四起，肆行劫掠，人心惶惶。他与县教谕配合募勇守城，费用皆由己出，保民平安，经大宪奏请，奉旨赏戴蓝翎。后又御匪有功，封赠“功绳忠壮”匾额。对于其他公益事业亦捐资很多，诰封朝议大夫，晋赠资政大夫。至其下一代亦皆以严守祖训，以德立身，事业有成。

程氏第三代、第四代中有建树的人物有：程立焯长子程增贤，程立炘次子程均，程立焯之孙，程增贤之子程銮，程立炜之孙，程熟贤之子程整，程立炘之孙，程均长子程鉴。

随着时代的变迁，军阀混战，市场萧条，程氏商业亦逐渐凋敝、停业。从程开聚开创“震泰”字号到清朝末年陆续停业，四代人达100余年。震泰这一字号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邑人云：“昔日震泰，以德为怀，精神永在，传承后代。”邑人有词云：“云边天外，昨日乌云退。春明媚，风清蔼。闲来翻史籍，似望前山黛。思量起，精英又似身边在。仁义书中载，向善志不改，训子弟，身先率，骄奢清梦断，勤俭无关隘。春来也，程家又起新生代。”程开聚从一个平民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形成良好家风，代代相传。

（本文主要根据历年《沭阳县志》《沭阳程氏宗谱》等有关史料整理——作者自注）

（作者原工作单位：江苏省商业厅）

清口枢纽中的顺黄坝及其河神庙

■ / 葛以政

在淮阴区码头镇张福河西侧的明远路北侧有一个顺黄坝公园(图一),公园中有一个顺黄坝埽工遗迹展示点,此处埽工遗迹就是修建明远路时挖路基时发现的。当时正是运河申遗的准备期,清口枢纽正愁缺少有价值的实物遗迹,市文物局就开展了顺黄坝的挖掘研究工作。市博物馆的几位同志在顺黄坝(黄河南堤的一部分)的北侧(原先的迎水面)向黄河底部开了几个探方,选择其中一个较有价值的探方进行了保护,就有了这个顺黄坝埽工遗迹展示点,从而建起了顺黄坝公园。



图一



图二

顺黄坝埽工遗迹展示点被保护在简易大棚内,进门向北可见一个下斜式的长方形土坑,挖掘时的土坑上中部是柴埽遗迹,还发现一些固定柴埽的竖木桩和许多铜钱,土坑下部是当时用于镇底的碎石。因柴埽已经朽化成为一层灰土,为了保护这层灰土,已在其上覆盖了保护层,从掀起的一角可以看到“灰土”,而探方中镇底的碎石可以一览无余(图二)。

这个遗迹展示点蕴含着清口枢纽形成过程中相当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清口枢纽黄淮交汇处由南向北移动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可以说明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在清口枢纽治理黄河使其由南向北移动的过程。

康熙年间为阻挡黄河水进入洪泽湖,康熙皇帝亲自勘察,规划指挥建起了御坝。康熙御坝在顺黄坝的南边较远处,呈东西走向。在御坝的侧挡之下,当时的黄淮交汇处在如今的龙亭附近,是一片很大的水域。黄河水是由此向东直冲卞家汪石工(康熙四十一年所建的护堤挡浪石墙)的。后来,为了减少黄河泥沙淤塞运口,康熙年间又开了陶庄引河将黄淮交汇处向北边推移,黄河水就直冲惠济祠而与淮河在惠济祠前交汇了,惠济祠西侧的天妃坝十分坚固地承受着黄淮之水的猛烈冲击。康熙皇帝南巡至此,必到惠济祠前观察黄淮交汇的滔天水情,指示治河方略,还在惠济祠中增供天妃,并改惠济祠为天妃庙,祈求天妃保佑漕运平安。乾隆皇帝首次南巡,就指示重修惠济祠,还亲自为重修的惠济祠写下碑文。碑文末尾,乾隆皇帝还兴高采烈地写下了“迎神送神之歌”,也是祈求



神灵保佑漕运平安。

《咸丰清河县志》中有一幅《乾隆四十二年河口图》(见上图)。图上的说明文字是：“乾隆五年以后，历次增建木龙，河势终未北趋。四十一年，督河两院勘议于陶庄积土以北开河一道至周家庄汇清东注，乃将清口东西束水坝移下改建于平成台，并于旧河内筑拦黄坝堵截断流；又自拦黄坝南坝头起至御坝顺水堤止筑拦堰一道，又自拦黄坝后起至顺水坝尾止筑撑堤一道，又自拦黄坝北尾起至河尾止于新河之南筑束水堤一道，又于拦黄坝之外筑土埽坝一道名顺黄坝，以为重障焉。”

这段说明文字明确地写出了“顺黄坝”的来历和作用。乾隆五年以后，为了使黄河的走势向北转移，不再冲击惠济祠，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河臣们采用木龙治水的办法，虽获一时之效，但“河势终未北趋”。乾隆四十一年，便于“陶庄积土以北开河一道至周家庄汇清东注”，其他一系列相应的配套工程暂且不论，关键的是此处出现了“顺黄坝”。“陶庄积土”以南是康熙年间所开的陶庄引河的旧河道，“陶庄积土”以北是乾隆年间所开的陶庄引河的新河道。开

了新河道，就必须堵塞旧河道。在旧河道的东端原黄淮交汇处先筑的是“拦黄坝”，在旧河道的西端后筑的才是“顺黄坝”。“顺黄坝”是“土埽坝”，呈西南往东北走向，北侧迎水，使黄河水顺着此坝向东北流淌。因为顺黄坝是新土所筑，为了保护顺黄坝不被黄河水冲刷，就在其迎水面上建起了很长的埽工。

埽工是将芦苇柴草捆扎在一起，密集置放在堤坝迎水面保护堤坝，再用木桩将柴埽固定在大堤上。埽工有堵决功能，更有护堤功能。考古工作者对于顺黄坝的功能，莫衷一是，有些文章将其认定为堵决。从《乾隆四十二年河口图》上的说明文字来看，顺黄坝上埽工的作用是护堤而不是堵决。旧河筑坝顺堤行水，是有计划的改变河道的行为，不是河道被冲决后的抢险行动。顺黄坝和拦黄坝在旧河段的两端作为阻挡黄河水的双重保障，顺黄坝使黄河水按人的意志向东北流淌，在惠济祠的北边与淮河交汇，惠济祠不再直接受到黄河水的冲击了。这是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乾隆皇帝南巡到此，还写过许多诗文(皆被刻在碑上，见后)。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治河大臣在顺黄坝后的陶庄

积土之上建起了河神庙,每年都用皇家祭典来祭祀河神(铜钱就是重要的祭神之物),祈求河神来保佑顺黄坝乃至陶庄引河和清口枢纽的安全。《乾隆五十一年河口图》中部可见顺黄坝上的河神庙(见下图)。

乾隆年间开挖的陶庄引河就是黄淮交汇处西侧的黄河河道,当时的黄淮交汇处现在已被二河截断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明远路张福河西侧的黄河。顺黄坝建成之后包括陶庄引河的南大堤从来就没有决过口,因此顺黄坝的功能就只能是护堤而不会是堵决。

顺黄坝上的河神庙在清口枢纽的运行过程中也有非常有趣的皇家故事。清口枢纽庙宇众多,乾隆后期南巡,曾经两次(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四十九)到此祭拜过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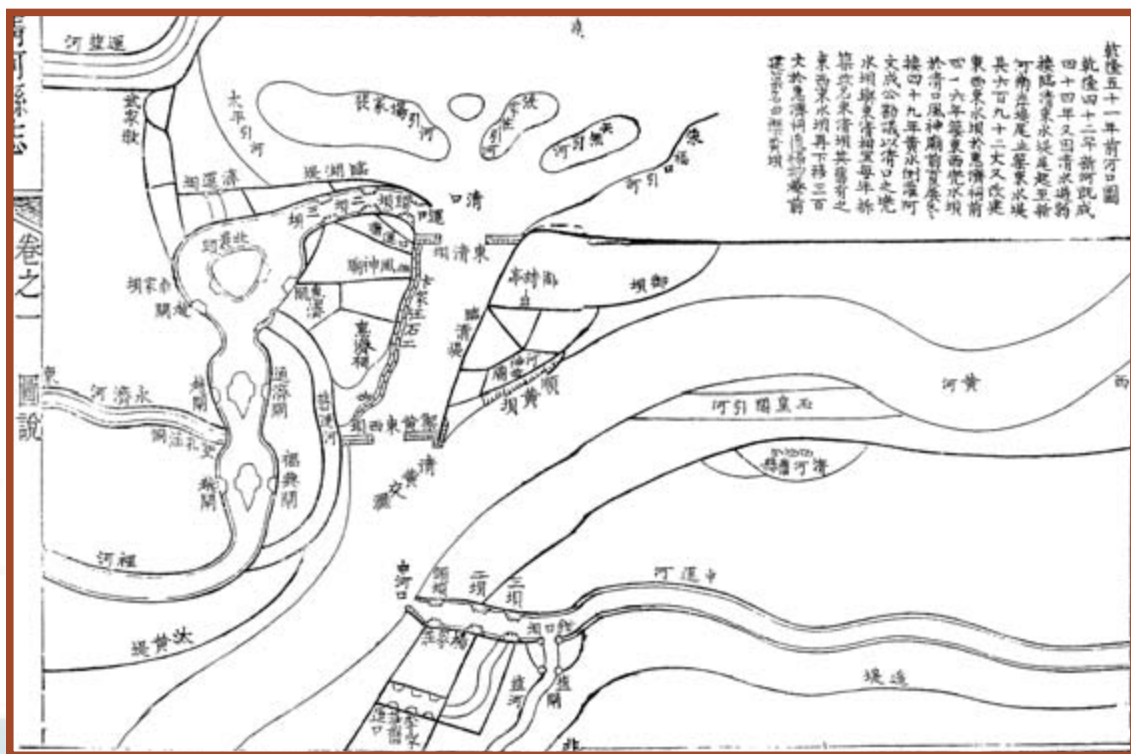
河神庙内原峙四块御碑,因皆为乾隆皇帝诗文,后人称之为“四龙碑”。四龙碑上分别镌刻的乾隆皇帝的御笔诗文,就是非常有趣的皇家故事,这些诗文不仅详细地表述了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在清口治理黄河的艰难和清代君臣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而且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时、神助、人为三者关系的认识,表现出在人力无法

回天的情况下对神的依赖和崇拜。为尽可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现根据《淮阴志征访稿》和淮阴区文史专辑《淮阴访胜》《淮阴金石录》等书的记载,综合纠误,斟酌标点,收录如下:

第一块碑上是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所作的《陶庄河神庙碑记》,其文如下:

成大事者,必有其时。事有视若易,尽人力而为之,然终于弗成者,则以天弗助,神弗相,而非其时也。事有视若难,尽人力而为之,而终于有成者,则以天所助,神所相,而适逢其时也。虽然天助也,神相也,无所为告之者也,使时有可乘而人弗尽力而为之,亦难望其有成也。故举大事者,必当审事机,乘时会,尽人力,以敬祈天助、神相;则庶乎奏平成之功,三者不可阙一焉。

吾于陶庄引河,益信此理之弗爽。陶庄之土逼河南流近清口,盖始自宋时南徙,历元及明,不知其几何年矣!于是,有黄水倒漾之患,于是有籍清敌黄之说。然而,清水常弱,黄水常胜,虽劬劬补苴,终不能得其要领,而倒漾自若也。惟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首见及于此,康熙己卯岁南巡时,即命开陶庄引河,俾远避清口,以



除倒灌之患，诚釜底抽薪之计也。其后，庚辰辛巳岁、壬辰甲午岁以及雍正庚戌岁，历任河臣屡挑屡淤，于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论。

迨乾隆己未岁，予命大学士鄂尔泰视河，仍持开引河之议，而河臣河员率以为难行。高斌向称为善治河者，亦以为功不易就；乃创建木龙，挑流北趋，图补偏救弊之为。于是引河之事更罢而无有言及者。然予以为，陶庄之引河不开，终无救清口倒灌黄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怀。适昨岁东巡，河臣吴嗣爵、苏州抚臣萨载各来觐，因见嗣爵老病，遂以萨载易之，与之谈及河务，以为海口淤泥之说终难行，至陶庄引河则必宜开而未敢必也。命其抵任，悉心相视。及萨载之任，与督臣高晋亲履其地，测量高下曲直，头尾宽窄，绘图贴说以闻。朕复详酌形势，以朱笔点记，往返相商者不啻数次。议既定，乃于去岁九月十六日兴工，以今岁二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长之候放流入新河，而旧河筑拦黄坝以御之。既放之后，新河顺轨安流，直抵周家庄，始会清东下，去清口较昔远五里，于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成。夫自康熙己卯逮今乾隆丁酉，历七十余岁，屡举而未成。及一举而遂成者，岂非时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复赖天助神相之所致耶！其能劬毖筹划，尽人力而不失事机，任投艰而弗犹豫者，则锡赉酬勋，国家之典具在。至夫天恩之赐助，盖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实昼夜在心默叩祷谢，无可言谕。而河神之佑相，非特建崇祠，其何以显明旣达群诚乎！爰即新口石坝建庙安神，俾司事者春秋洁祀，以邀惠于无穷，并为迎神、送神之词以协律焉。

第二块碑上是乾隆皇帝的草书《迎神乐》，诗曰：

河之旧兮本南，每灌清兮黄兼。

神之相兮北渐，即运河兮赖永恬。

迎神之来兮俎豆，甘于万斯年兮恩沛覃。

第三块碑的正面是乾隆皇帝的草书《送神乐》，诗曰：

河之新兮移北，既避曲兮就直。

神之相兮南塞，去清口兮无复逼。

送神之还兮惟幕，饰于万斯年兮恒戴德。

第三块碑的阴面是乾隆皇帝的草书，乾隆四十五年仲春所作的《陶庄河神庙瞻礼六韵》。诗曰：

大河南北酺陶庄，逼溜恒虞清灌黄。

几度兴工工未就，一时赖佑佑诚长。

改前果向新渠徙，善后还培旧坝障。

用答神庥祠宇建，永祁民宥肆筵苴。

瓣香此日申诚悃，峻碣多年志感庆。

皇祖鸿谟幸因葭，守成惟励敬无遑。

第四块碑上是同年（乾隆四十二）暮春上浣，乾隆皇帝所作的《河复记》及其后来所作的相关诗文。

《河复记》文曰：

河之复也，以堤合龙；龙之合也，以天佑神助。然天之佑广大精微，不可以一二事举，亦不可以一二日期。神之助则有可以显示昭灵、事举日期者，此义已见于丁酉陶庄河神庙之文；而复有显示昭灵、声应底绩之旆，是不可以不记。仪封决口之筑，移金门，开引河，历以年余，迄未成功，亦无别法；于旧冬仍为大开引河，图掣溜归壑之为。及今春二月，阿桂等始有“十一日两坝合龙，随填压茭土，不逾数刻，金门立即断流，俟十分稳固，即驰报合龙”之奏。未数日，合龙之奏果至，然所谓“自行合龙”之语，不解何谓兹。阿桂以善后大局已定，来行在复命。细询之，乃称二月十一日仪封漫口，未合龙以前，金门尚阔三丈，水深十一丈余。至午时，忽报顺黄南坝沉坠，惊往勘视，则南坝埽根全势向北移走，陡与北坝接连。时金门水面深止一二丈，尔时见机可乘，随将合龙秸料赶紧填压，不三四刻，已见断流，而埽底亦无翻花过溜。若非南坝向北沉坠移走，则三丈口门下埽合龙，非三两日不能完竣。今机缘巧合，因败为功，以两载之勤劬，收功片刻，实由至诚感召天和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更非在事诸臣所敢望云云。自前岁河决后，予无一日不叩天祷神，冀速合龙，以佑苍生。昨初十日，渡黄河于香棚及陶庄河神庙，更益竭诚默吁；而十一日，遂有两坝自行合龙，黄流顺归故道之事。此岂非天佑神助，前记

所谓适逢其时者欤？予非敢自诩诚之能感，若谓能感，则前岁至今二月初十以前，岂诚之未至耶？而神之显示昭灵，实不可以不志。或谓陶庄在江南，仪封在河南，云一则不可两处各有庙，云二则此未能及彼。夫一佛而为百千亿化身，姑不必论；即苏东坡论韩昌黎，所谓如水在地中，无往不在。昌黎不过文宗，尚能如是，而福国佑民之正神，固当论其在此在彼，是一是二耶！及蒙庇荫，合答麻社，予惟虔玃玃，日甚一日，永祈安澜之锡。仪封合龙之处，已命建庙答祝，当别有记；而此陶庄实予竭诚蒙佑之所，因命树碑记实，亲书勒石，一如前建庙之例。时庚子岁暮上浣之吉也，乾隆御制并书。

同年清和月又书记之于后曰：

按：记中有“河南流近清口，始自宋时南徙”之语，未甚明确。盖《宋史》所称“神宗熙宁时河道南徙，寻经塞治”，即苏轼复黄楼之诗所由作也。惟《统志》所称“金明昌时，河淮并为一渎”之言，为黄河南徙之实据。然彼时有宋存焉，淮泗一带非金所有，地当属之宋。此因今作河复诗考订而得者，则向之所云“自宋时南徙”亦未为不可，特未详明言之耳。因附书本记后。

同年清和月《陶庄河神庙瞻礼作》诗一首：

春仲渡河日，瓣香敬祷中。
何期即翼旦，显佑沐明神。
南坝忽移北，无心自合唇。
崇祀绝鸿祝，惟益励虔寅。

乾隆四十九年仲春上浣，《陶庄河神庙瞻礼叠庚子诗韵》：

读宗丁酉徙陶庄，清口从兹弗患黄。
爰敬河干修庙恤，永祈神佑福民长。
更疏北岸防沙逼，仍葺南堤挑水障。
是日斋心谒灵宇，光春额手肃清芴。
合龙庚岁叨殊宥，复旧癸年荷笃庆。
宣导无能频赖惠，日虔同悚两增遑。

同年春闰月下浣《陶庄河神庙瞻礼》：

庚子仪封坝，合龙显佑殊。
兰阳癸卯日，故道顺流趋。
彼此胥神祝，虔诚谒庙谟。
北坝会清远，昭事益钦吾。

读懂以上四龙碑上的文字，我们就能得到当时清口枢纽治理过程中的许多重要信息，我们就能看出乾隆皇帝对陶庄引河开挖成功的喜悦心情，我们才算是真的了解了顺黄坝在陶庄引河中的重要作用！

嘉庆皇帝因国力渐衰，不再南巡，但心悬清口，派两江总督到清口将“惠济祠”和“河神庙”画好图纸，送到京都，于御园内仿建了惠济祠与河神庙，嘉庆皇帝亲自生香展礼，就近祈求海神、河神在清口保佑漕运平安。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嘉庆皇帝又向内阁发出上谕：“江南清口建有惠济祠，供奉天后神像，素彰灵应，曾于乾隆五十三年钦奉谕旨，颁发祭文，令地方官于春秋二季虔诚致祭，列入祀典。朕前因厪念河防，不能亲诣神祇吁祝，特于御园内仿照江南规制建立惠济祠、河神庙二所，岁时生香展礼。自兹以后，连岁普庆安澜。仰庇灵庥，实深虔感。因思清漪园、静明园两处龙神庙均有春秋致祭典礼。御园惠济祠、河神庙显应尤昭，允宜特奉明禋，以光祀典。著于每岁春秋二季，一体致祭，届期奏派管理圆明园大臣一员肃恭将事。即自本年秋季为始。钦此。”由此可见，清口的惠济祠和河神庙在嘉庆皇帝心中的地位之高。

道光以后，国力日衰，治河更为艰难，皇帝南巡，更成泡影。咸丰五年，黄河北徙，清口枢纽内顺黄坝上的河神庙不再起任何作用，其被冷落以致损坏就毋庸置疑了。

河神庙被毁时间不明。抗日战争前夕，张煦侯先生看到的河神庙遗址和四龙碑情况，在《淮阴风土记》中有如下记载：“去陶家闸而行，过黄河，益南登顺黄坝上，东望码头镇，万瓦沉沉，午烟直上，杨柳风来，隐闻百丈牵船之声。……瞥见有二三片石，卓立东北，摄衣往观，乃见碑四，其高皆丈许，有一碑倦而覆地。野人告余，此地为河神庙废基，庙为乾隆四十三年敕建，诸碑皆砌于殿壁，岁久庙圯，乡民争取零砖断甃以去，惟碑得留。余就读其文，一为《河神庙碑记》，一为《河复记》，余皆御制诗，并乾隆所撰也。碑阴尽敕清文，蠕蠕然不可辨

运河中埂切除记

■ / 申卫华

说起京杭运河的历史,也许老运河人不会忘记,在她流经一千多公里的腹地,曾经有一段“肠梗阻”。所谓的“肠梗阻”,其实就是一条运河的中埂。

当年的运河中埂,像一条丘陵,更像一道疤痕,一直竖躺在苏北运河扬州高邮至淮阴淮安(县)境内的水面之上,全长一百多里。这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拓宽大运河,依旧河道两岸开挖新河道,原两河岸则成新旧河道中间的“中埂”,由此,留下的历史“遗迹”。此段运河一路由北向南,宽窄不等,高低不平,在古老的运河上,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疤”和印记。埂宽之处与东岸河堤相连,偶有河床显现;埂窄之处,隔开两条运河,新老河道“和平相处”。而埂高之处似土堆的小山,沿岸村民充分利用,将有的“小山”开辟成砖窑。埂低之处,有的则藏卧水下成为暗礁,暗礁之上的河水又将新老运河连接。每到春暖花开之季,在沿岸村民、渔民充分利用和无心“装扮”下,埂上那绿油油的麦苗,

黄灿灿的菜花,挺拔整齐的杉树,弯腰亲水的垂柳,在运河之中呈现出的又是另一番景色。只是当年连温饱都未解决的运河人,根本无心欣赏这运河的美景,白白让他留在了运河船民、沿线村民对运河的记忆中。不过,中埂的景色再好,也没有给京杭运河带来发展与实惠,正是由于它始终制约着运河的水上运输,则像一段发炎的盲肠,而随着“肠梗阻”的越发严重,为运河埋下了运输不畅和事故频发的隐患。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由于中埂在运河中的存在,运河苏北段也只能行驶百吨以下的船舶,这与黄金水道的称号名不副实。尤其在枯水季节,船舶航行到此处水域,到处都面临着潜在的威胁。如两个稍大的船队交汇,就必须避开较宽的运河中埂,稍有不慎,靠近中埂的一方就有搁浅的危险。笔者当年,就曾多次跟随运河航道巡航船,帮助遇险船队脱离运河中埂的困扰。

运河要发展,中埂必清除。1981年的3月,正是改革开放的春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

识。逆意所云,必亦与汉文大旨无爽。诸碑大都追次本末,明引河之议出自宸衷,……”。

由此可见,河神庙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就连“零砖断甃”都成了乡民房屋的建筑材料,“丈许”原皆“砌于殿壁”之碑(可知没有碑座和碑冠),“有二三片石,卓立”原处,“有一碑倦而覆地”。

据相关资料记载,此四碑于1968年遭到损

毁。失去了相当重要的金石见证,幸而录下了碑上的内容,现在只能靠相关古籍记载来探寻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碑中内容经杜涛同志校正,更为准确,特此说明)

(作者系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办公室主任)

里,在视察了苏北运河后,当机立断的提出了“充分利用水运,继续整治和利用京杭运河分流北煤南运,减轻铁路压力”的重大决策。两个月后,国务院终于作出了续修京杭运河的历史决定,而古老的运河,从此也迎来了旧貌变新颜的春天。1982年的10月,运河苏北段的重点整治会战,终于在一百多公里的中埂水域拉开了帷幕。当年底,来自苏北扬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徐州等五市十多个县的数万民工,汇集到一百多里的运河线上。运河见底的工地,人山人海的场面,大幅标语的悬挂,彩旗飘扬的两岸,河工号声的震天。那工程,那场面,那规模,那场景如同当年的淮海战役,箩筐、铁锹、独轮车、手扶拖拉机,成了运河线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笔者有一位叫首选的邻家大哥,百里迢迢从老家灌南,带来了40多位同乡,在苏北运河整治工地,披星戴月地奋战在河内河外,堤上堤下。为了超额完成每天的土方工程,邻家大哥和他的同乡们,不怕吃苦,不计报酬,不讲得失,不辞辛劳,从每天凌晨一直干到深更半夜。由于劳累过度,终于有一天,他突然累倒在被挖平的运河中埂处。虽然当时进行了急救,但他还是将自己30多岁的年轻生命,贡献在了大运河上,留在了运河两岸人民的心中。

当年,邻家大哥和他的同乡们,对运河倾心的付出,是数万民工,集体奉献精神的一个缩写。正是他们的付出和奉献,苏北运河才改变了它的沧桑历史,焕发出改革开放的“美好青春”。从此,苏北运河正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古老的,似“羊肠小道”的邗沟(历史上苏北运河淮扬段最早称邗沟),在数万民工三个月的奋战下,转眼间变成了苏北运河中,河面最宽,河道最直,航行条件最好,沿岸景色最美的河道,黄金水道也从那一刻起,终于实至名归。而再看那阻碍运河畅通和发展的中埂,也在当年“变废为宝”,成了加固运河两岸河堤,加宽运河东岸公路的宝贵资源。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运河新貌。运河中埂已成为历史和记忆。遥望今天的大运河,确实令人骄傲。大运河确实大得实在,大得可爱,看着她申遗的成功,千舟的竞发,风光的无限,人民的富足,真让咱淮安人感到欣慰和自豪。现如今,京杭运河正加快发展和现代化的步伐,用它那灿烂的笑容,宽阔的胸怀,崭新的身姿,迎接那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淮安市公安局内保支队)



征·稿·启·事

本刊热忱欢迎历史与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及有一定研究的爱好者赐稿。要求稿件主要以淮安地方文史为主题,严实述史,依据行文。特别欢迎有关建国以来淮安地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文化系统及文艺界的“三亲”史料。来稿请注明作者电话和详细通联,一经采用,即奉帛酬。

投稿邮箱: hazxwsw@163.com

电 话: 83606013

《淮安历史与文化》编辑部

高铁新区水系调整工程考古工作 现重大成果

■ / 胡兵 刘冰

日前,南京博物院、淮安市博物馆顺利完成我市高铁新区水系调整工程茭陵一站引河段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出土大量文物。其中许多考古发现将进一步佐证淮安作为淮河文明重要发源地的史实,并为淮安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供更加坚实的实物证据,对我市当前和今后的文化事业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一、考古发掘基本情况

高铁新区水系调整工程茭陵一站引河段项目位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乡黄岗村范围内,属于黄岗古墓群文物埋藏区。其中位于黄岗村9组的小丁庄墓地,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12座,时代从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出土器物共1000余件,有陶罐、陶鼎、陶壶、铜盆、带钩、铜镜、玉片、玉璧、玉蝉等。目前已发掘完毕,场地移交建设方。

位于徐杨乡黄岗村的黄岗遗址地下文物埋藏十分丰富,遗址面积6万余平方米,时代跨度大、文化内涵丰富,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体,并见西周、汉、唐宋元明诸时期遗存。截至11月底,已清理不同时期房址、墓葬、灰坑、灰沟、烧土堆积及洞类遗迹等各类遗迹3600余处,出土了大量陶、石、骨、玉、琉璃、铜、铁、瓷等质地遗物。

黄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是本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发现,发掘已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它为青莲岗文化的存在和内涵提供了充实的考古依据,证实了淮安作为淮河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就目前发掘所得初步分析,可将其分为两

大期。一期遗存分布于发掘区的中北部,灰坑、烧土堆积及洞类遗迹等分布密集,陶器类主要有釜、鼎(锥状足)、钵、罐、壶、盃、豆、支脚、拍等;二期遗存分布于发掘区南部,遗存文明化面貌与一期差异较大,新出现了匜、三足钵、杯等器类,彩陶开始大量出现。此外在发掘区遗址南侧边缘发现疑似古河道,与遗址原始地面落差达到10米以上,疑似古河道内陶片、动植物遗存十分丰富,并见明显的淤积层理,这为研究遗址所属时期的环境变化及其与聚落变迁兴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对黄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环境重建、古地貌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等多学科合作研究已逐步开展,用于准确测定遗址绝对年代的碳14测年样品已送至美国BETA实验室。

二、考古研究价值

小丁庄墓地是目前江苏省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汉代墓地,主要为小型墓葬。其分布密度大,时代跨度长,为研究淮安地区汉代墓葬布局、分期及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延续时间为战国晚期至新莽时期,为同时期淮安地区中小型墓葬分期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地层学依据。小丁庄墓地随葬品大多位于脚部或身侧,极少数位于头部。随葬品主要为泥质灰陶罐,这与淮安其他同时期墓地(群)相异,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黄岗遗址作为淮安“青莲岗文化”的重要考古成果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自青莲岗

遗址发掘60年来,该区域考古工作几乎再未取得重大突破。关于“青莲岗文化”的内涵、时空框架乃至存废等一系列问题曾一度引起学界热烈讨论,时至今日仍无定论,甚至被部分学者全盘否定。淮安黄岗遗址的发现和大规模发掘,是重新认知青莲岗文化以及淮河故道沿线距今7000至55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重要契机。黄岗遗址弥补了“青莲岗文化”考古发掘实物证据不足的缺憾,使淮安具有7000年文明史的依据得到进一步论证和充实。

三、遗址保护建议

小丁庄墓地范围大,墓葬分布密集,此次发掘的部分仅位于墓地南侧,发掘区北侧还存在有大量同期墓葬。同时,其附近可能还存在有

其他时期的墓葬或遗址,建议在后期开发建设前开展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充分考虑墓地分布范围,确保地下遗存安全。

黄岗遗址为目前已知保存状况最好、内涵最为丰富的青莲岗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考古勘探已探明遗址的四至范围,建议保护范围内不再进行任何可能会危及到遗址本体的建设行为。同时可以参照成都金沙遗址公园的方式,结合周边环境绿化工程,建设小型考古遗址公园或博物馆,进行原址陈列展示、原场景和复原展示、多媒体展示。这一遗址的发现,为我市增添一处旅游景观和文物保护单位,提升了我市文化旅游的品位,成为我市悠久历史文明的重要见证。

附:淮安黄岗遗址部分出土文物

壹01^{part}

Táo Fǔ

陶釜



贰02^{part}

Táo Dǐng

陶鼎



叁03^{part}
Táo Guàn
陶罐



肆04^{part}
Táo Bō
陶钵



伍05^{part}

Táo Yí

陶匱



陆06^{part}

Sān zú bō

三足钵



柒07^{part}

Hé
盃



捌08^{part}

Táo Pāi
陶拍



玖09^{part}

Táo Qiú Táo Zhū
陶球、陶珠



拾10^{p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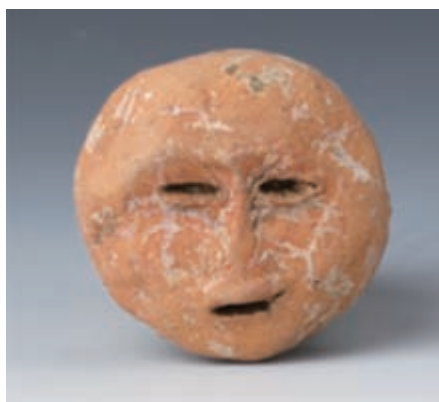
Fǎng Lún
/
纺轮



拾壹11^{part}

Táo sù rén miàn
/

陶塑人面 (已知最早的淮安人艺术形象)



(作者分别系淮安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淮安市博物馆八级职员)

盱眙博物馆馆藏西晋佛像造像 砖鉴赏与探究

■ / 罗志

江苏省盱眙县境内古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以秦汉东阳城、唐宋至明清泗州城为代表的古城址与大云山西汉诸侯王陵为代表的古墓葬,出土有大量的文物与考古资料,对于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很多极有价值的线索。这里,我们仅就盱眙县博物馆馆藏西晋佛像画像砖为例,做一点鉴赏和探究。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南北动荡不安,盱眙为临淮要地,更首当其冲,故这一时期所留存的文物资料颇为有限。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盱眙境内多处西晋墓葬中相继出土了一批画像砖。这些画像砖多为青灰色,一般砖长36厘米、宽17~18厘米,其花纹均为模印,有的三面花纹,一面铭文;有的四面皆花纹,还有一种只在长侧面或短侧面有花纹。这些画像砖纹饰精美,题材多样,具有西晋时期画像砖石的典型特征。

盱眙馆藏西晋佛像画像砖于1974年在盱眙城南的沙岗出土,同墓葬出土的还有带铭文“太康九年五月”的墓砖。“太康”为晋武帝年号,太康九年即公元288年,结合墓葬形制和墓砖纪年,可断定其为西晋墓葬画像砖。

这块画像砖长37厘米,宽17.5厘米,砖的一平面有上、中、下三幅端坐的佛像,佛背部有佛光,左右手各执有两枝莲花花蕾,双手置胸前,神态恬静,安逸,属于典型的早期佛教造像“项光佛”形象。砖的一长侧面有飞天图案,上刻绘三个飞天,雁行于空,衣裙飘曳,彩带飞舞,体态俏丽,翩翩起舞,翱翔天空,三个飞天中间用花蕾间隔作为装饰。画面为模印,画面图案全部用凸线条表现。南京博物院、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日本龙谷大学等中日专家编纂的《佛

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便收录这块集佛像和飞天像为一体的佛教文物资料。该

块佛像画像砖曾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于2004年作为国宝在日本展出。

从佛教文化史的视角看,盱眙出土的西晋佛像画像砖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佛教初传入中国的时间,学界尚无定论,一般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传授《浮屠经》,作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东汉乃至西晋时期,佛教尚以异域而来神仙方术的面目传播,故汉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足可见汉晋上层贵族对于早期佛教的认识。东汉时期与佛教信仰有关文物遗存开始出现,然而为数极少。近年考古发现的一些早期佛教遗物,据考证都是汉代的作品,如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四川乐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内发现的陶制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这些早期佛像造型也以刻绘古朴、单个或多个佛像简单排列居多,或刻绘于墓葬砖石之上,或塑形于墓葬明器用具上,作为超度死者、礼奉神仙的象征而流传,并没有形成南北朝以降复杂的佛教艺术体系。

曾经一段时期,佛教研究注重自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及内地,即北传佛教路线的研究。近些年来,我国南方的早期佛教遗存,越来越受到重视,南传佛教,或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入中国的佛教传播路线愈发清晰。现在的考



古材料来看,东汉乃至西晋时期,我国南方出现不少具有佛教文化因素的画像石、佛像图纹铜镜、带佛像摇钱树(尤以东汉四川地区为盛)等器物,鎏金铜像、陶瓷佛像等更具艺术表现力的早期佛教造像也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盱眙出土的西晋佛像画像砖,其形象具备汉晋早期佛教造像的普遍特征。我们可以稍作比较:

四川乐山麻壕崖墓的享堂顾枋上有高浮雕佛像,高37厘米,厚37厘米。高肉髻,绕头有圆形项光,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手法为平面凸起的阳刻,上体刀法很深,露出的手和下体衣纹都用阴线。附近风格相同的崖墓中有东汉顺帝永和(136~141),桓帝延熹(158~167)纪年铭刻,可断此佛像年代。

四川彭山县汉代崖墓出土灰陶摇钱树座,通高21.3厘米,座上塑佛像。佛像头上肉髻,刻阴线纵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趺坐,着通肩袈裟,阴线衣褶,线条分明。旁立二侍者,右胁侍穿交领衣,手持物,左胁侍右手举起。座下塑双龙衔璧。其年代处于东汉偏晚时期。

山东沂南汉墓出土有线刻项光童子像。在墓中室八角柱南面和北面上端,各刻一童子,绕头有项光。此造像的年代为东汉晚期。

此外,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也存在佛道交融的佛教题材造像,其内容以释迦牟尼佛的本生和本行故事为题,有佛、菩萨、弟子、力士和供养人等造像,风格古朴,与同一时期南方佛像造型存在一致性。

宿白先生在《四川摇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一文中,将早期中国南方佛像的典型造型归纳为高肉髻、具项光、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的高浮雕佛坐像。宿白先生的论断大致依据东汉晚期的乐山崖墓高浮雕佛像、沂南汉墓项光童子像、彭山崖墓灰陶摇钱树座等佛教造像特点以及三国吴至西晋时期南方陶瓷罐贴塑佛像的整体特征。对比盱眙西晋佛像造像砖中的佛像造型特点,虽然其年代差不多要稍晚一个世纪左右,不过“高肉髻、具项光、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的早期佛像造型特点非常明显。

从盱眙馆藏西晋佛像造像砖出发,我们还可以对于汉晋时期早期佛教在今天苏北、苏南地区的传播情况作一点探究。

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楚王刘英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与盱眙地区所在的临淮郡相邻。据《开元释教录》卷一记载,东汉末年盱眙所在的临淮郡便有高僧严佛调,此为文献所见之我国最早的出家僧侣。又据《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据说可容三千余人,其中还安置了身穿锦彩衣物、铜质涂金的佛像,这是中国的造像立寺首次见于正史记载。而东汉下邳位于今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与古盱眙地区同属临淮郡,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改临淮郡为下邳国。再佐之以连云港地区约为东汉时期开始凿刻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可见汉晋时早期佛教造像传播过程中,今苏北地区为重要中心。

此外,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治下,名僧康僧会从交趾到吴国传教,于赤乌十年(247)在建业立建初寺,设像行道,其后支谦等僧侣也避乱入吴。自三国时代开始,早期佛教在南方逐渐扎根,并以建业(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为中心,最后发展成“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江南佛教盛况。盱眙地区在六朝时期长期隶属于南朝范围之内,且其地理位置也距离江南佛教中心不远,东吴至东晋时期的苏南佛教传播对于盱眙的影响也不应忽视。

在汉晋早期佛教传播史中,盱眙虽不起眼,然而其处于苏北、江南两大早期佛教中心之间,在盱眙的西晋墓葬中出现早期佛教文化遗物,自然亦非意外。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佛学专家汤用彤又指明东汉的佛教是依附于道教而存在的。盱眙出土佛像造像砖无疑是早期佛教文化研究难得的实证资料,而这也是这块看似平淡无奇的画像砖背后所隐藏的重要文物信息。

(作者单位:淮安市志办)

淮三路探源

■ / 张其书

细心的朋友会注意到淮安市区有两个淮三路公交站，一个括号注明“清江浦区”，另一个括号注明“长江西路”。前者7路公交车经过，后者则有39路、100路公交车经过。为什么要加括号呢？原来淮安市区有两条不同的淮三路。一条在清江浦区，一条在淮阴区。淮阴区的淮三路东起长江西路淮州中学附近，西至三树镇，为X306县道的一段，连接淮阴区城区与三树镇，故名淮三路。而清江浦区的淮三路走向为东北——西南，东北起于解放西路南门小街附近，西南至京杭大运河边的市运河船业有限公司。该路宽只有5米多，长只有1.5公里，这在市区实在是一条“小”路，难怪很多人不知道淮三路在何处。至于这条路为什么名叫“淮三”，“淮”指什么，“三”为何意，更是说不清楚。

有人说，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条路边上有一家建筑单位，叫淮阴建筑公司三工程处（即淮阴市第三建筑公司的前身），“淮三”是这家单位的简称，淮三路由此得名。此说显然牵强，殊不可信。淮阴建筑公司三工程处可以简称“三建”“三处”，或者“淮建”，又或者“淮三建”，不应该叫“淮三”。如果他可以简称“淮三”，那简称“淮三”的单位可就太多了，岂不乱套？再者，淮阴建筑公司三工程处这样规模不大的单位，不可能成为地标。市区师专路、电机路、机场路、港口路、军营路、轮埠路等皆由重要的地标得名，但是，淮阴建筑公司三工程处够不上成为一条路名称的资格。

其实，别看这条路这么不起眼，他可是大有来头的。近阅《淮阴市志》（淮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在上

卷307页发现这样一段：

民国19年，始建淮宁路，其中武墩至蒋坝一段筑于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上，民国23年完工。民国25年春加以修整。1955年江苏省交通厅投资改建为石子路面，宽3.5米，7月完工，可通车至三河闸，故称淮三公路。

也许有人会说，此淮三非彼淮三，淮三公路与清江浦区的这条淮三路风马牛不相及。

且慢，请看，还有这样的记述：

淮宁路起于市中心淮海广场，经淮阴县武墩、和平，洪泽县高良涧、蒋坝，盱眙县马坝，安徽天长县，至江苏六合县接宁六公路至南京。……市区段自城南大运河桥1960年建成通车后，由原经人民南路（旧公园路）改线由淮海路（原博古路）进入市区。

这段话告诉我们，1960年城南大运河桥建成通车前，淮阴车辆出城区经由人民南路，也就是说，走完人民南路便是出了市区，上了淮三公路。1958年大运河开挖前，由此直至武墩上二河大堤。大运河开挖后，则要轮渡过河。大运河桥建成后，车辆进出市区改为经过淮海路，过大运河桥后沿今柯山路向西至轮船码头附近上淮三公路。

淮三公路改道后，解放西路至大运河轮船码头的这段路，仍然被人们称为淮三路。以后三河闸以南公路修复通车至浦口，称淮浦公路。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淮阴车辆可直达南京，遂改名为淮宁路，并定为205国道南线。而淮阴至三河闸的淮三公路渐渐被人们遗忘。

今日清江浦区的淮三路是旧淮三公路的一

清江大闸出土的康熙《阅河》诗碑述略

■ / 胡锦涛

2003年6月下旬,在淮安市区清江大闸拆迁工地发现一通康熙御诗碑,碑额与碑趺不存。该碑为原址出土,曾刊立于清江大闸正闸北侧。后由闸口日杂商店胡广林私人收藏,因拆迁在即,胡家自愿将御碑移交给淮安市博物馆保存。该碑高2.13米、宽0.91米,石面字迹清晰完整。碑面上镌刻康熙皇帝书《阅河》七绝诗一首,行书体,竖3行,满行12字,共30字(见右图)。

诗曰:

淮黄疏浚费经营,跋涉三来不惮行。

几处堤防亲指画,伫期耕稼乐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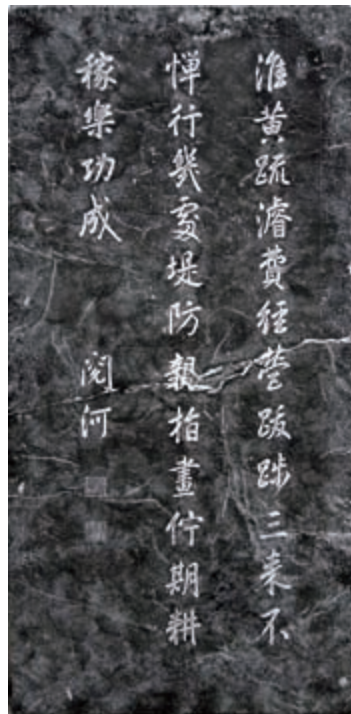
阅河

末镌“康熙宸翰”“敕几清图”钤印二方。

碑下端附有河道总督于成龙^①小楷跋文25行,满行13字,共228字。录文如下:

己卯孟春,恭逢皇上南巡,亲阅黄运两河。臣成龙于二月二十八俯伏恭迎,侍从前驱。即随圣驾驻蹕河干,敬承指画方略,仰见睿鉴周

详,度越千古。臣成龙只惟凛畏遵循,小心夙夜。荷蒙天颜下霁,异数频加,至金山寺赐御书绫匾一幅、阅河诗一幅、对一联,臣成龙跪捧之下伏。念运米西陲,旋逢奏凯,皆由天威指授。今者巡视两河,宜疏宜筑,咸出圣明乾断。臣成龙时



康熙书《阅河》诗碑拓片

^①清代康熙王朝重臣中出现了两个于成龙,即两江总督于成龙和河道总督于成龙(又称“小于成龙”)。此碑勒石者为小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号如山,汉军镶黄旗人。以荫生授乐亭知县,康熙时官至河道总督。卒谥襄勤。

段。由于大运河的开挖和大运河桥的建成,这段路不再是淮阴通向南京方向的要道,以致几十年后仍然是一条“小”路。

淮安市区连接外地的公路被废弃或者改道以后,市区一段仍然存在,成为城市街道,不再另外命名,仍用原来的名字。淮三路当属此种情况。这在淮安市区还有一例,即清扬路。清扬路是清江市到扬州市的公路,如今淮安到扬

州的公路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也不再叫做清扬路,但留在市区的这一段还叫清扬路。

清江浦区的淮三路是这样的不起眼,但他从1930年修建至今,经历了80多年的风风雨雨,留下了淮安沧桑的历史。今日淮安,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公路铁路四通八达。抚今追昔,谁不感叹!

(作者单位:清江浦区区志办公室)

恐奉行未善，致有陨越，乃叠荷宠锡天章，荣褒华袞，感激拜扬，惶愧无地，惟有损糜顶踵以图仰报圣恩于万一耳。兹谨摹勒用垂贞珉，庶使大小臣工群相仰，宸藻焜煌，光昭百代云。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吉旦

臣于成龙恭纪

此《阅河》诗碑刻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由河道总督于成龙勒石并附记。读《绎释于成龙〈重修高家堰汉寿亭侯关帝庙碑记〉》(葛以政撰文)得知：康熙三十一年(1692)靳辅去世之后，康熙皇帝便派于成龙接任河道总督，于成龙在治河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从康熙三十二年撰写的《重修高家堰汉寿亭侯关帝庙碑记》落款可以看出，于成龙当时任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授为正一品加四级，可谓位高权重，康熙皇帝对他寄予厚望的。康熙三十四年(1695)，皇上亲征噶尔丹，让于成龙以左都御史的官衔督运粮饷。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皇帝再将河道总督的位置交给了于成龙。此碑就是他续任第二年刊立的。

这首七言诗是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视察清口治河时所作。所阅之河，就是黄河与淮河。明清时，黄、淮、运汇流于清口(今马头杨庄一带)。黄河夺淮以后，清口遂为黄、淮、运合流处，“治河、导淮、济运三策，毕萃于清口一隅”。^①明清两朝践行“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治水方针，延续了500年的经营与扩展，在清口及周边近50平方公里区域，逐渐创建了规模宏大，系统完整及科技先进的水利工程枢纽，列为运河全线最为关键的区段。据《清史稿》与《清河县志》记载，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三，康熙帝第三次南巡时携允缙、允祉等七个皇子奉皇太后，于二十八日抵达淮安府清河县境。康熙帝随后视察了高家堰等处堤工，然后召集随行大臣桑额、河道总督于成龙等钦定治河方略，颁布《修浚清口诏》与《巡视河湖酌定应办工程诏》，其主要方略有：(一)深浚河身。康熙帝在诏书中指出：“朕留心河务，体访已久。此来沿途坐

船外审视黄河之水，见河身渐高，登堤用水平测量，见河面高于田。清口、高家堰则洪泽湖水低，黄河水高，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无从出，泛滥于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此灾所由生也。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诚能深浚河底，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七州县无泛滥之患，民间田产自然涸出。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终无益也”。(二)筑挑水坝。康熙帝诏书曰：“宜将黄河南岸近淮处河堤东延二三里，筑令坚固，淮水近河之堤亦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河之水不致倒灌入河矣”。(三)开陶庄(今淮阴区码头镇境内)引河。康熙帝钦命：“挑引(河)从惠济祠后入河，而运河再向东斜流入惠济祠交汇，黄水自然不倒灌”。(四)浚直河道。康熙帝亲谕：“宜于清口西，数曲处试行浚直，河直则溜自急，溜急则沙自刷而河自深”。(五)拆除拦黄坝。康熙帝命拆除涟水云梯关(今响水县黄圩镇境内)附近的拦黄大坝，浚直海口河道，使黄河直流入海，加速水流，荡涤泥沙。

查阅上述诏令的具体内容，我们不仅了解到康熙作《阅河》诗的历史背景，而且可以体会到他对治理河工的良苦用心，正如诗句开头所云：“准黄疏浚费经营”。经过实地的细致勘查，康熙对自己制定的治河方案充满信心，他期盼治河尽快取得成效，让江淮百姓过上耕稼力田，安居乐业的温饱生活。河道总督于成龙的小楷跋文，也称颂了康熙在钦定河务中“睿鉴周详，度越千古”，以致取得“运米西陲，旋逢奏凯”的伟绩。同时他对皇上指授方略“只惟凛畏遵循”；对恩赐褒奖深表惶愧与感激。

本文还要说明的是在征集过程中，淮安市博物馆考古人员经调查发现，因该碑倒伏年久，加之无人识读碑上于成龙刻的小楷跋文，造成清江浦一带老百姓误传为是乾隆御制碑，民间还编造出乾隆皇帝在清江大闸尿急的故事。此碑的发现对于还原御碑的历史面目及见证康熙帝清口治水功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者单位：淮安市博物馆)

^①《清史稿·河渠志》

博物馆应成为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

■ / 潘新 赵巧凤

廉政,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四》:“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而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谓做官,就是首先端正自己,你自己端正了,谁还敢不端正呢?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将廉政建设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系人心向背的大事、要事常抓不懈。而廉政文化教育作为廉政建设的基本手段,其本质是对受众进行道德层面的教化和感染,其目的和意义就是将廉洁、廉正的道德操守,润物细无声般地渗透转化成为一种被世人普遍认可并接受的“廉荣贪耻”价值规范,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一、博物馆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的意义

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95年修改后的章程中是这样定义博物馆的:“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和其发展服务的、非赢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公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从中可以看出,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目的或责任,而且是一种面向全社会、广泛的社会教育。因而,如何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从而更好地挖掘弘扬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廉政思想精华,实现廉政文化资源向教育资源转化,对于推进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博物馆里,人们不仅可以获取社会历史文化知识,在内心与文物丰富的历史内涵发生情感共鸣时,潜移默化中还会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强烈爱国主义与崇高民族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从而对价值观念、思想境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博物馆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殿堂,作为时代精神和公益文化的一个窗口,应该也必须利用自身阵地优势和教育职能,以先进文化为动力,突出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以全新的工作理念和传播方式面向社会,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努力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淮安运河博物馆资源优势

淮安运河博物馆,坐落在清江浦大闸口历史文化风貌区里运河中洲上,是一座具有浓厚运河文化特征、浓烈地方文化气息、浓郁生态园林特点,以反映和展示淮安运河文化及其衍生的戏曲文化、名人文化等为内容的博物馆群。运河博物馆总占地面积12.4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下辖清江浦记忆馆、淮安戏曲博物馆、淮安名人馆、清江浦楼、陈(瑄)潘(季驯)二公祠(兼大运河名人馆)、“三范”故居、程莘农故居及吴公祠、斗姥宫等,各场馆通过运用图板书画、幻影成像、多维全息数码互动游戏、声光电技术等动静结合的布展方式,呈现了运河历史、地方戏曲、地方名人、漕粮运输、河道治理、漕粮仓储对“运河之都”淮安的影响。淮安运河博物馆先后被授予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中华文化海外交流基地、淮安市优秀对外宣传示范基地、淮安市文明旅游风景区等荣誉称号。

三、运河博物馆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的举措

(一)思想重视,整体推进博物馆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建设。

以淮安运河博物馆为例,该馆始终坚持把



清江浦记忆馆

开展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制定建设规划,明确建设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把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建设融入博物馆群管理的全过程。重视示范基地建设,发挥运河博物馆网站、宣传橱窗等载体作用,切实推进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全面开展。

(二)丰富载体,扩大博物馆廉政文化教育宣传内容。

该馆以“建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为工作着力点,深入挖掘现有基地蕴涵的丰富的廉政资源,从中提炼出与廉政文化相得益彰的运河文化、戏曲文化、名人文化精髓,重点发掘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德艺双馨的艺术品格、淮海戏在战争年代的革命贡献,和淮剧《情与法》《新旅战歌》《英雄刘老庄》等经典剧目,以及以周恩来、关天培、枚乘为代表的系列文化名人所折射出来的廉政文化要素,提取并形成廉政文化理论精髓,集中以实物、图片、文字等形式展示给观众。

1. 戏曲文化是廉政教育的有力教材。淮安拥有以京剧、淮海戏和淮剧为代表的三大剧种。淮安籍的京剧大师周信芳是京剧麒派的创始人,被誉为战斗的表演艺术家。他的表演艺术是战斗的现实主义在京剧舞台上的伟大胜利。从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次年,直到全国解放,在近五十年的岁月中,他经历了多次的社会重大变革。期间创作了《宋教仁》《王莽篡位》,反映五四运动的《学拳打金刚》,“九·一八”事变后编演的《徽钦二帝》《打渔杀家》以及《文天祥》等

反映爱国、正义进步为主题思想的剧目。

淮海戏在战争年代被称为革命小戏。抗日战争时期,淮海戏艺人们与新文艺工作者一起,积极宣传,鼓动抗日,编排了近百出现代戏,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解放战争中,部分艺人肩背步枪,手提三弦,随军转战南北,参加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横渡长江,直到上海。现代淮海戏《闪闪红星》《永远的红手印》《粉祸》等廉政题材的剧目从革命小战士、人民的好党员沈浩、缉毒英雄等不同层面诠释了廉政文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淮剧也是淮安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运河博物馆收录了《情与法》《孔繁森》《新旅战歌》《英雄刘老庄》等一批以反映廉政文化为主题的剧目,并以实物、模型、图片等形式加以物化,展示给观众。

2. 名人文化是廉政教育的坚强导师。该馆收录了以周恩来、枚乘、梁红玉、关天培为代表的一批准安籍历史文化名人。通过深入发掘和提炼这些名人辐射出的廉政文化光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继而在广大干群廉政教育中不断推广和宣传。西汉辞赋大家枚乘,其代表作《七发》,从不同侧面展示枚乘本人及其倡导的廉洁思想。毛泽东曾在《七发》的批注中写道:“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

南宋巾帼英雄梁红玉击鼓抗金以及清末民族英雄关天培虎门抗英的故事在民间已广为流传。南宋建炎四年,梁红玉登上船楼亲执桴鼓,与8000宋兵将金兀术的10万金兵围困在黄天荡中,杀得金兵船毁人亡,金兀术也几乎投江而亡。1834年关天培任广东水师提督,镇守虎门。1841年有18艘英舰来犯,关天培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与敌人决一死战。他在开战前给家人寄去一个匣子,里面放着几枚牙齿和几套旧衣服,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战斗期间,他亲燃火炮,督励士卒,多次杀退来犯英军,直至身受重伤壮烈殉国。梁、关两位英雄以自己必死的

信念英勇顽强地抗击了外敌,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教育和廉政熏陶。淮安也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该馆建设了以弘扬“周恩来倡廉精神”为主题的展示专区,展示区通过视频、油画、图片、出版书籍等形式体现了周恩来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高尚品德。

3. 文化活动是廉政教育的直观呈现。运河博物馆自开馆以来,已累计举办、协办各类文化活动数百场次。相继推出月月戏相逢、相约古戏台等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经常开展廉政文化文艺演出。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积极进行廉政宣传。“相约古戏台”群众文化活动获评江苏省“五星工程奖”服务项目奖。

(三) 广泛宣传,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充分利用博物馆网站和各种形式的主题教育展览等载体,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扩大廉政文化辐射面,把廉政文化的内容进行多样化渗透,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开展多场廉政历史文化知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将廉政历史文化知识送进市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传达到社区的大街小巷,激发人们了解淮安、热爱家乡情怀的同时,广泛宣传了廉政文化,使人们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廉政文化的教育,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为了弘扬淮海戏艺术大师谷广发等老一辈艺术家德艺双馨、艰苦朴素的品格,该馆相继编辑出版了《谷广发谈艺录》《淮安历史名人小传》等书籍。同时,还收集和出版各种廉政教育主



清江浦记忆馆内的民居模型

题的戏曲演出音像资料、书籍,供游客观看和选购。多次参加中国博物馆协会举办的博物馆博览会并获奖。中央电视台、台湾中天卫视、江苏卫视、湖南卫视等多家媒体曾先后对运河博物馆作过报道。

(四) 强化服务,着力提升博物馆参观接待水平。

淮安运河博物馆推出“五心”接待服务品牌(热心接待观众、爱心服务观众、耐心引导观众、虚心面对观众、诚心帮助观众)。自2009年开馆以来,该馆已累计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其中多次接待了国家、省(部)级领导,给来馆参观的领导 and 游客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如今,淮安运河博物馆通过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已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文化熏陶的一个极好场所。

总之,淮安运河博物馆充分利用博物馆的阵地优势,强化教育职能,调动各方面参加廉政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整合各方面的廉政文化资源,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正确引导党员干部高举旗帜,坚定信念,永葆本色,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博物馆廉政文化宣传教育的整体水平,为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作者潘新系淮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八级职员;赵巧凤系淮安运河博物馆综合科科长,文博馆员)



淮安市运河博物馆内古戏台

记华中第一次群众工作会议

■ / 於剑山

一、华中地区群众工作发展状况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靠着十分成功的群众动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才在八年的艰苦抗战中不断壮大,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华中地区因为有着一批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共产党人的领导,在新四军、八路军进入这一地区短短五六年时间里,即有了长足的发展。时任华中分局民运部部长、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刘瑞龙将1946年之前华中的群众工作分为四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1939至1940年,解放区初创,群众工作随之开展。这一阶段,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组织工作团进行群众工作,首先团结了一批集镇知识青年。1940年后逐渐进入农村地区,在个别乡村进行了减租减息及增资运动的尝试,但大部分地区仍以宣传为主,未付诸实施。

第二阶段,1941至1942年,群众运动初步发动。这一阶段,农民运动是运动的中心,工青妇工作也相继开展,群众团体会员发展到119万,占当时全部人口1600万的7.1%(据1942年春统计),农村阶级关系也开始变化,但多数地区仍未充分发动。

第三阶段,1943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群众运动普遍深入发展。这一时期,查减普遍进行,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由于群众斗争的深入,部分地区发生了自发性的反恶霸运动,中心区封建统治优势被打垮了,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开始确立起来。

第四阶段,群众运动从一度停滞至重新活

跃。抗战胜利前后,党与群众团体忙于战争动员,虽巩固与扩大了解放区,但遇时局变化,蒋敌伪合流,造成群众情绪波动,个别干部右倾情绪生长,群众运动形成自流状态。直到华中局扩大会后,华中分局成立,并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的指示》,决定党内从上到下建立民运部门,群众团体系统从上到下恢复起来,各地群众运动才又重新开始活跃。

由于华中党组织的积极推动,华中解放区的群众发展起来了。群众的发动摧毁了封建统治制度,工农劳动人民翻过身来成了主人翁。通过普遍减租和部分减息及生产运动、组织合作社、废除苛捐杂税等,减轻了封建剥削,改善了群众的生活。通过组织发动,基层武装及政权大都掌握在群众的手中,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得以确立。群众的发动,大大支持了战争,推进了解放区的建设。党在运动中也发展壮大,全华中党员由1941年的5万人,发展到18万以上。

同时,在群众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弱点。一是发动还不够充分,运动的发展及优势的确立还不平衡不巩固。部分地区波动较大,弯路较多。运动中缺乏组织及教育群众的工作。各部门工作脱节,工作不深入,有脱离群众的情况。

二、华中第一次群众工作会议召开过程

为了贯彻华中局扩大会坚持华中阵地的指示,更有力的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争取在不久将来的和平民主阶段中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克服目前群众运动中的自流现象,提高全党的群众观念,华中分局于1945年11月29日发出指示,要加

^① 刘瑞龙《反攻以来华中群众运动及今后任务》,载《刘瑞龙淮本文集》(下)P639-65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强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依靠群众。为此,华中分局于1946年1月14日至3月8日,在淮城(今淮安市淮安区)文庙召开华中第一次工农青妇民兵代表大会(亦称华中第一次群众工作会议),会议历时54天,出席会议的有各分区各界代表共270人,各直属机关列席人员47名。^①大会主席团由邓子恢、谭震林、曾山、张鼎丞、刘瑞龙、李一氓、曹荻秋、李坚贞、章蕴、赵敏、王文长、王野翔、曾涛、沈策、杨岩、冯国柱、李广仁、张维成、江风、李云鹤、范长江、张德义、李兆祥(农民领袖)、王兴成、黄元喜、王凤山(民兵英雄)、胡书乐、汪淑媛(农村妇女)、郭铭等29人组成。

因会议原定于1月13日召开,^②因此在会议召开之前一天,即1月13日,《新华日报》(华中版)即发表社论《祝华中工农青妇代表会议》,提出这次大会的四项主要任务:

1、进一步团结、发动和组织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与新四军并肩奋斗,保卫和平民主幸福生活、保卫解放区,从而争取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并保证人民在今后和平时期主人翁的地位。

2、研究华中群众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讨论决定今后群众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步骤等,以展开全面发动群众的新局面。

3、重视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工作,选拔优秀群众干部,加强华中解放区群众运动的领导。

4、检讨非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培养与发扬民主作风,确定群众团体的独立系统,促进群众运动的开展。

社论称:“总之,这个会议应当成为保卫解放区争取全国和平民主的动员会议,应当成为放手发动新解放区群众翻身抬头的会议,应当成为巩固老解放区群众优势的会议,应当为开展春季生产救荒运动作充分准备,应当为全面开展工农青妇民兵工作、进一步组织群众大多数、彻底转变作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应当成为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开展群众运动新局面的

会议。”^③

1月14日至23日,是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由领导同志作报告。开幕典礼上,华中分局民运部长、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刘瑞龙致开幕词,他提出,当前发动全华中千千万万的人民,开展群众运动是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全国民主。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对会议提出了以下要求:

1、要确立明确的群众观点和明确的群众路线。

2、确立具体的方针政策,讨论与解决具体的问题。

3、关于群众组织本身建设问题、性质和作用等,需讨论研究,达到认识与具体解决。

4、会议的组织方式不能只是领导报告下面听,而要采取分区讨论,类似整风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既要总结经验,也要揭露缺点。^④

开幕典礼后,中共中央委员、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为与会者作时事报告。接着,中共中央委员、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还在会上作了题为《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的发言,号召全华中的三十多万革命工作者一起来为华中两千多万人民服务,使人们都能过好日子。全篇发言语言质朴,十分富有感召力。当天下午,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向大会代表讲怎样正确认识目前时局,强调要巩固全面和平。华中分局常委、组织部长曾山在讲话中要求在发动群众中,不忘组织群众生产。华中文协代表黄源则向大会报告今后华中文化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的志愿,即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以上演讲结束后,大会通过了以章蕴等七人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赵敏等七人为章则起草委员会委员,黄源等七人为文电起草委员会委员。最后会议一致决定通电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要求全国实行减租减息、救济灾民、改善全国军队官兵生活,实行民主;并通电延安,向毛主席致敬。

1月19日,张鼎丞再次到会传达中共七大精

① 《工农青妇民兵代表大会开幕》,《新华日报(华中版)》,1946年1月16日第1版。

② 《新华日报(华中版)》1946年1月13日第1版有一则消息《华中工农青妇民兵代表会议今日开幕》,称“该会定于今日开幕”,但此后的新闻与各种材料、以及后来相关的回忆文章均可以确定会议的正式开幕日期是1946年1月14日。

③ 《社论:祝华中工农青妇代表会议》,《新华日报(华中版)》,1946年1月13日第2版。

④ 刘瑞龙《大会开幕词》,华中分局民运部编《华中解放区工农青妇民兵第一次代表会议文献》,第3-4页。

神,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①1月21日,邓子恢再次到会,用了一整天时间作了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的报告对于群众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及今后群众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作了解答。其中重点阐述了为什么要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放手发动群众是我党领导革命的基本路线,是群众争取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唯一方法。党在历史上的历次失败,包括皖南事变新四军的失败都是由于群众路线的执行不力。今天我们虽然有了120万军队,有广大的解放区政权,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参政,但我们的力量与地主资产阶级对比还未占优势,与帝国主义对比则更弱,因此我们不能自满自足,必须更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把四万万五千万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战胜国内外反动势力,而达到革命最后胜利与人民彻底解放。

邓子恢更进一步提出,发动群众不但是工作的方法,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军队作战主要就是为了扫除发动群众的障碍,我们建立民主政权与颁布法令,是为了创造便于发动群众的法律根据与有利条件……总而言之,一切应该适于发动群众的总方针,违背了这一点就是错误的。”相反地,“如果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而脱离群众,那末我们还是要失败,而且自己要腐朽下去。“几十年来新军阀的产生,都是由于人民不能起来自己掌握军队的缘故。”^②

在邓子恢作工作报告后,大会进入第二阶段。讨论时,按照“七大”的路线,结合邓子恢的报告,检讨过去工作,讨论今后工作任务及方针。会议采用分区讨论的形式,本分区意见一致后提交给大会作总结,突出的典型经验由分区推荐到大会上发言。如《泗县孟圩村群众大翻身》《孟圩村的一窝虎》等总结了群众减租减息、翻身解放、组织生产的道路。《河下镇纺织工人从曲折的过程中组织起来》介绍了组织工会,发动工人的经验和教训。《泗南县管镇妇女的纺织和民校》《王维德互助组》《王业久的大众合作社》《泗沫县今年生产工作中整理和组织劳动互助组问题》《领导互助组的经

验》等均反映了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群众工作的具体问题。这些典型经验的汇报人都是群众运动的一线亲历者,很多人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尽管文化水平不高,连稿子都是请人代为整理的,但亲身的经历所带来的鲜活的事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根据华中分局的指示和群众代表的意见,刘瑞龙为大会作总结报告,为今后华中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提出指导性意见。报告共分四个部分:^③

第一部分,总结了华中六年群众运动的伟大成就及成绩取得原因,同时,也提出对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发展不平衡和群众优势的不巩固等弱点。

第二部分,和平民主阶段华中群众工作新任务。分别就新解放区、老解放区、城市工作、边缘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安排,并对于新解放区惩奸运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发展生产、劳动互助、合作社、民兵工作、群众文化等具体问题,介绍先进经验,提出解决办法。

第三部分,对于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儿童工作提出具体任务。今后群众团体组织的任务,是群众团体的独立和组织群众大多数,力求群众组织的普遍平衡发展。

第四部分,标题为打开放手发动群众的道路,主要为解决群众工作中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我们是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的解放,只有中国人民自己才能担负起这个伟大艰巨的任务。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能胜利,就是因为领导依靠人民,受广大人民拥护。而中国人民的最大多数是广大的农民,不相信农民,便会遭受损失。

刘瑞龙最后强调:“一切运动必须成为群众运动。”要树立群众路线的作风,就必须打破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恩赐观点、利用观点。既要为群众,又要靠群众。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华中解放区工人联合总会、华中解放区农民联合总会、华中解放区青年联合总会、华中解放区妇女联合总会等群众团体的

① 《张司令传达七大精神》,《新华日报(华中版)》,1946年1月22日第1版。

② 邓子恢《为什么要发动群众》,华中分局民运部编《华中解放区工农青妇民兵第一次代表会议文献》,第8-12页。

③ 刘瑞龙《今后华中群众工作的任务》,华中分局民运部编《华中解放区工农青妇民兵第一次代表会议文献》,第13-22页。

领导机构及其负责人。

华中解放区工人联合总会,主任为赵敏,副主任为王振生、杨汉章、谢浩荣、张赢。华中解放区农民联合总会,主任为张维城,副主任为曾涛、王守基、黄以干和胡书乐。华中解放区青年联合总会,主任为范长江,副主任为郭铭、刘星、李庚和刚生。华中解放区妇女联合总会,主任为章蕴,常委为李坚贞、章蕴、徐敏、张哲明、江成志、邓六金、伍任平、周建兰、石坚、郭健、汤若愚、朱霞、谢飞、何庆、江彤、钱讷仁和巴燊容。华中学生联合总会筹委会,主任为李庚,副主任为谢承昭、陈彬。华中解放区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为罗克明,副主任为王新成、刘起源、宋云龙、韦周郁。这些群众团体的领导人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所属各界的知名人士,在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基础上,也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

最后,本次会议形成了《华中解放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决议》《华中解放区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华中青联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华中解放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决议》《苏皖边区保护工厂劳动暂行条例(草案)》《华中解放区公营工厂与工会集体合同暂行准则(草案)》《华中解放区职工会联合总会章程》《华中解放区农民联合总会章程》《华中解放区青年联合总会组织章程》《华中解放区学生联合会总会章程(草案)》《儿童团章》《华中各界妇女联合会组织章程》《华中解放区工联总会、农联总会、青联总会、妇联总会、总武委会联合各全体会员书》等一系列决议。

三、会议的影响与评价:

群众大会的召开,使华中地区的群众运动渐入高潮,华中分局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力量加强突击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城市与农村并重,惩奸反霸,清算旧帐,推翻伪政权,建立民主的基层政权,肃清敌伪残余势力。然后,迅速转入减租、减息和增资的工作。老解放区则巩固基层群众政治地位,在救灾中贯彻减租工作,组织群众的生产,发展劳动互助生产合作运

动,并进行乡选及县选。在运动中必须大胆提拔地方干部,完成组织群众的大多数的任务,确立起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武装群众,大力发展民兵;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大胆个别吸收成份好、斗争积极的工人、雇工、贫农入党,达到现有党员数量的两倍到三倍,一切有群众团体的地方,必须建立党的支部。

在华中分局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边区的群众工作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群众组织不断壮大。在五分区,至1946年5月工农青妇会员就发展到90余万人。华中分局与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两淮即成立了淮安市总工会(会员3000余人)、淮安市行业工会(会员4929人)、清江市总工会、华中机器业职工总会、华中邮务总工会等。^①人民群众满腔热情地投入救灾惩奸、减租减息增资、大生产、废保甲、改造基层政权等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人民的力量,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随后的华中土改运动以及很快到来的自卫战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当然,由于大会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处于和谈时期的情况下召开的,整个工农青妇民兵代表大会普遍对和平前景比较乐观。刘瑞龙在大会开幕典礼上即提出“过去我们的群众运动是为战争服务的,今后就要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全国民主,发动全华中千千万万的人民,为这个目的而奋斗”。^②邓子恢也在发言中称“我们今天是处在和平建设的新阶段,今后斗争将由以武装斗争为主转到非武装斗争为主的新的斗争形式”。^③因为对战争很快爆发的可能估计不足,这次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因内战爆发引起局势的变化未能全部贯彻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次大会的影响。

(作者系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资料科科长)

① 周正本、朱珠、花实《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4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594—59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

② 刘瑞龙《大会开幕词》,华中分局民运部编《华中解放区工农青妇民兵第一次代表会议文献》第3页。

③ 邓子恢《为什么要发动群众》,华中分局民运部编《华中解放区工农青妇民兵第一次代表会议文献》第12页。

陈毅与洪泽湖

■ / 钱万平

“扁舟飞跃趁晴空，斜抹湖天夕照红。夜渡浅沙惊宿鸟，晓行柳岸雪花骢。”这首景生情，情生景，情景交融的美丽诗篇名叫《过洪泽湖》，他的作者是抗战时期威震敌胆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

说起陈毅同志与洪泽湖，确有一段情缘。

抗战时期，陈毅同志曾两次代表新四军军部到淮北根据地检查和指导工作，一次赴延安途经淮北，都与洪泽湖有过交集。

1941年11月初，陈毅从当时驻扎在盐城的新四军军部第一次来到淮北区党委机关和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驻地——泗南县半城（今属泗洪县）。11月4日，淮北行署召开教育行政会议，总结边区教育行政工作，陈毅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指示。会后，他还为淮北党委机关刊物——《人民通讯》亲笔题词：“把人民切身利益与整个民族的利益联系起来解决，是我们群众工作的中心主张。”在此期间，陈毅同志还为四师政治部编印的《拂晓报》创刊三周年题词，称赞《拂晓报》办得好。陈毅这次检查与指导工作，在洪泽湖畔逗留近两个月，12月底才返回军部。

陈毅同志第二次到洪泽湖是1943年的3月25日。在此之前，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策划了“摩擦”，企图一举消灭四师于洪泽湖西岸。四师根据陈军长的统一部署，进行自卫反击，发起了山子头战役，不仅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还活捉了韩德勤。为了处理

和释放韩德勤，陈毅同志从淮南的黄花塘军部北渡淮河，来到洪泽湖西半城。

这次陈毅同志在听取了四师主要领导的汇报后，召见了韩德勤。陈毅同志义正辞严地阐述了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和方针政策，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摩擦破坏抗战的阴谋，并严正指出韩德勤侵占淮北根据地是背信弃义的行为，遭到活捉是自食其果；同时规劝韩德勤改弦易辙，与共产党和衷共济，共同抗日。在韩德勤心悦诚服，答应不再与新四军搞摩擦，并对新四军抗战给予帮助的承诺后释放了韩德勤。

礼送韩德勤出境后，陈毅同志在彭雪峰、邓子恢等陪同下游览了大柳巷，并留下总题为《大柳巷春游》的六首绝句。“淮水中分柳巷洲，平沙绿野嫩丝抽。春郊试马优游甚，难得浮生似白鸥。”字里行间可见陈毅同志心情大好；在同一时间写的《淮河晚眺》这首诗里，陈毅同志甚至要“我欲骑鲸跋浪行”。

1943年11月下旬，陈毅同志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经过洪泽湖。彭雪峰对老上级、老战友远行依依不舍，两人开怀畅饮，彻夜长谈。虽然此时的陈毅同志还身陷“黄花塘事件”之中，但他胸怀磊落，并不为然，这种心态在《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一诗中“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可见一斑。

（作者系淮安市诗词协会办公室主任）



“淮上三美”——林颖

■ / 王海洋



彭雪枫与林颖

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宝县(县治岔河镇)是鱼米之乡,淮扬粮仓,素有“淮上明珠”之美称。淮宝县委妇女部长,因德才兼备、相貌出众,被誉为“淮上三美”(德、才、貌)。她就是后来与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结成革命伴侣的林颖同志。

林颖同志1920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樊城磁器街(今襄阳市樊城区望江街道)一个资本家的家庭。原名周裕群,后改名周玉琼。林颖这个名字是她参加革命后因工作需要改的,以后就沿用了下来。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一弟二妹。

林颖很小的时候就进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洋学堂学习。她性格活泼、倔强,富有奋斗精神,家人称其是具有男子气度的女子。1938年5月,读初中的林颖在襄阳中学一位老师的影响

下,在家乡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为了摆脱家中为她安排的封建包办婚姻,林颖没有告诉家人,偷偷告别了故乡,被党组织派往有“小延安”之称的河南竹沟参加河南省党员训练班学习。从此,林颖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1939年11月,林颖被调往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工作,次年任河南省永城县八区区委组织委员。

1940年8月,新四军五支队开辟苏北淮宝泗抗日根据地,成立民主政府淮宝县,县委、县政府驻岔河镇(今属淮安市洪泽区),林颖任中共淮宝县委妇女部长。

林颖在淮宝县做妇女工作时,追求妇女自由、独立、解放,并且以敢讲真话著称。在她的组织领导下,1941年成立淮宝县妇女抗日救国会,13个基层组织有会员1170人。1943年,吸收土地复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22589人入会,会员总数达29909人。1945年,淮宝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撤销,成立淮宝县妇女联合会。



岔河镇原淮宝县政府旧址



彭雪枫与林颖

林颖眉清目秀、精干伶俐,在淮北地区有“淮上三美”之称。后经中共淮北区委书记刘子久和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介绍,林颖与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结成革命伴侣,并于1941年9月24号在四师驻地洪泽湖西半城镇结婚。婚后第三天,追求人格独立的林颖为了革命工作,没有和彭雪枫生活在一起,继续返回淮宝县工作。因此,从结婚到雪枫同志牺牲的三年时间中,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不足半年。时间虽短,但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爱情的忠贞却处理得很好。



林颖与儿子彭小枫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将军在河南夏邑不幸中弹牺牲。彭师长阵亡的消息封闭了4个多月,直到林颖生下他们的儿子彭小枫才被公布。林颖带



八十年代 林颖与彭小枫

着万分悲痛,继续奋战在彭雪枫将军未竟的抗日战场上,直到抗战胜利结束。

解放战争后,林颖调任中共淮安县委委员兼临城区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颖同志先后任大连渔网厂党总支书记、小平岛区区委书记,大连纺织厂党委书记,纺织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劳动工资处处长,北京市自行车总厂厂长,北京市轻工业局副局长,纺织工业部机械局副局长(中国纺织机械总公司副经理)。

1985年10月,林颖同志离职休养。次年,林颖携儿子彭小枫(时任解放军某师政治部主任,后任第二炮兵政委、上将军衔)到岔河镇探访。回到阔别40多年的淮宝县,林老心潮澎湃,往事历历在目。她见到老区人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感慨,她看到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甚感欣慰。岔河人民喜笑颜开,张开双臂欢迎林部长“回家看看”。热情的拥抱,亲切的交谈,美好的回忆,激动的泪水洒满浍河两岸。

林老一直关注淮宝老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她曾为洪泽县纺机厂“黄麻并条机”的生产、销售,给予帮助和支持。

2015年8月5日,林颖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林老虽然去世了,但她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爱民情怀永远值得老淮宝人们的学习,老区人民永远怀念她!

(作者为淮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委特邀文史委员)

新四军瓦解淮宝地区刀会纪事

■ / 赵光明

抗日战争时期的淮宝地区东至运河、南至三河、西至洪泽湖，北至淮阴区的码头镇。即洪泽县洪泽湖以东地区各镇和西顺河镇，以及淮阴区的吴城镇、南陈集镇、赵集镇，清浦区的黄码乡、武墩镇、和平镇、盐河镇，淮安区的南闸镇、林集镇、范集镇、三堡乡，金湖县三河以北的吕良镇、金北镇、陈桥镇、前锋镇，宝应县的山阳镇。淮宝地区是个富庶之地，盛产大米、黄烟、鱼蟹、芦苇等，素称“苏北粮仓、鱼米之乡”。这里湖河港汊、沟渠圩堤纵横交错，地形十分复杂，虽然陆路不便，水路却四通八达。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新四军5支队领导同志(从左至右):郭述申(政委)、张劲夫(政治部主任)、罗炳辉(司令员)、周骏鸣(副司令员)

1940年7月，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共同决定，为接应八路军南下，支援苏中反顽作战，命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向三河以北进军，开辟淮宝地区。八月初，我军渡过三河，对国民党顽固派作战半个月，韩德勤部三十三师主力被歼两个团之众，其余逃至运河以东。至此，参加开辟淮宝的新四军、八路军与韩德勤

部作战告捷。但与韩德勤收买利用的刀会斗争，却颇费周折。

淮宝地区的刀会最初产生于1935年前后，那时洪泽湖、高宝湖、白马湖芦苇丛生，港汊纵横，是湖霸盘剥、土匪出没之地，烧杀抢掠，绑票勒索，时有发生。老百姓不堪其害，加之国民党官府和反动军队的逼税骚扰，经常的水灾之患，实在是民不聊生。于是一些人利用封建迷信，组织起刀会，请“师父”练把式，旨在自卫。刀会也曾下湖剿过土匪。但不久，刀会遂被地主和豪绅操纵。1938年前后，各地水灾严重，百姓外出逃荒者甚多，刀会难以维持，曾一度解散。

1939年3月，淮阴(今淮安市)、淮安(今淮安市淮安区)城沦陷，靠近城郊和运河沿线广大农民处于日伪军的残害下。加之1938年国民党炸开黄河花园口，致使苏北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后，淮宝地区土匪孽生，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逃到淮宝，老百姓惨遭土匪、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践踏。于是人们开始酝酿着筹办小刀会，打日军，防土匪，抗苛捐杂税，保卫家乡。1939年春，盐河以北一带农村率先拉起刀会与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土匪战斗，影响广泛，获得许多村庄农民的响应。1940年春，国民党三十三师和秦庆霖部占据淮宝后，控制乡镇，拉夫抽税，无恶不作。一些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也趁机拉队伍，扩充势力，抓壮丁，派粮筹饷，侵犯了一些地方上层人物的利益。于是各地拉起小刀会与之对垒。他们以“打日寇，防土匪，抗苛捐杂税，保家保乡”为战斗口号。要求不管穷人子弟，还是富户人家，30岁以内的男女青年都要参加，大姑娘参加“花篮会”，小伙子参

加“小刀会”。不去者罚大洋5元,没钱就拆房拉牛。乡里设“会”,保里置“堂”,风行一时,遍及淮宝各地。参加刀会以后,要一天三拜,跪会堂,念咒语,吃特制的神砂、朱砂等麻醉药物,然后就发狂般地舞刀弄枪、练气功和武术。有的刀会头子还备有短枪。但是由于刀会既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又无严肃的组织纪律,更无严格的军事训练,全凭封建迷信把人们组织在一起,加之刀会中一些会首逐渐变成了地方势力派,他们手中有了实力,便随意抓人杀人,违背刀会的宗旨,开始走上歧途,被国民党顽固派所利用。

1940年7月下旬,新四军五支队列阵于三河南岸。韩德勤感到这时再与刀会作对实为下策,便转变策略,由镇压改为收买利用。他答应刀会的一些条件,约束自己的部队,不得骚扰百姓,以缓和关系。继而封官许愿,用重金、钢枪收买当地豪绅和刀会头目,并利用他们散布一系列攻击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恶毒谣言。胡说什么“罗炳辉是大肚子,一天要吃一个小孩”“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新四军抓住大姑娘小媳妇,要扒光衣服,奶头上扣铃铛,推磨扭秧歌……”千方百计制造老百姓特别是妇女、儿童对新四军的恐惧心理,煽动刀会仇恨共产党。这样一来,韩德勤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刀会由封建性的群众自卫组织变成封建性反动武装组织而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1940年8月3日拂晓,新四军五支队刚过三河,刀会的哨兵便吹起牛角号示警,一时间十里连角,此起彼伏,很快传遍淮宝各地。刀会会徒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对驻新集附近的新四军突然袭击,砍杀新四军通讯员、炊事员多人。国民党暗藏分子,刀会头目孙逊趁势指挥刀会中的亡命之徒,胸前斜挂黄色符带,满脸煞气地排成几列,挥舞大刀在阵前冲杀。后边几千会徒,黑鸦鸦一片,手执大刀,嘴里喊着“刀枪不入”,“老祖保佑”,对新四军的政治喊话全然不听,疯狂地向新四军驻地新集冲杀,并动手夺新四军枪支。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罗炳辉司令员命令部队对刀会头子和赤膊上阵的亡命之徒开枪还击……,会徒们一见“刀枪直入”,知道受了



罗炳辉司令员和根据地孩子们合影

刀会头目“刀枪不入”的宣传欺骗,如鸟兽般散去。新四军从此战中取得了打击刀会反动头子、不追击逃散会徒、争取刀会群众的成功经验。加之新四军部队纪律严明,买老百姓的粮食、蔬菜都照价给钱,住在民房里不骚扰群众,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老百姓担水做好事。罗炳辉司令员还常常在部队开饭时亲自拿馒头给孩子们吃,有时还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给孩子们讲故事。这一来,坏人的反动宣传就渐渐不起作用了。但一些顽固的反动刀会头目仍与新四军为敌。

8月6日上午,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在新集召集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有个刀会头子又纠集千余刀会分子进行破坏。罗司令对这个头子说:“你们刀会不是说自己刀枪不入吗?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试试,三枪打不死你,我罗炳辉拜你为师。”刀会头子同意了。只见他当场服了丹药,练了一会“刀枪不入之功”,就说:“开枪吧!”罗司令给一个战士下令:“开枪!”结果一枪就把那个刀会头子打死了。让群众亲眼看到刀会头子宣传的“刀枪不入”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但一些反动刀会头

子还是横下心与新四军作对,他们纠集千余刀会分子进行破坏,再次被新四军打退。这时,为协同开辟淮宝的八路军五纵队南下先遣队(胡炳云、田文杨大队)从泗阳众兴镇南进到高良涧附近,遭到刀会阻击,老红军副营长杨占山和通讯员、司号员去高良涧同刀会谈判,但刀会头目不讲信用,八路军谈判人员刚到,便被他们无理捆绑起来,不由分说,就押往洪泽湖边菱角塘之南,砍头示众。杨占山同志临刑前大义凛然,沿途不仅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政策,还义正辞严地说:“为了抗日,我死无憾,但两位红小鬼刚十六、七岁,请你们放他们回去!”但反动的刀会头目置之不理,三位八路军战士,最终惨遭杀害。我军因此受挫,不得不北撤泗阳。

八路军战士惨遭刀会杀害的消息传到新集后,新四军五支队指战员无不义愤填膺。罗司令员当即命八团主力开赴高良涧,严惩刀会的反革命活动。新四军刚进到南甸,刀会便从四面围攻上来,新四军迅速占据河堤,设置障碍,构筑工事,架起了机枪,命令部队不许单独离开工事出击,采取打敌人骑兵的办法,战士站一排,跪一排,趴一排,密集火力,同时射击,冲在前的刀会会徒纷纷应声倒毙,后面的见势狼狈而逃。这次战斗,新四军毫无损失,而刀会死伤和被俘者甚多。高良涧的刀会闻风而逃。8月中旬,新四军五支队十团分别在马棚庄和黄集南面的大楚庄击退刀会的围攻。8月23日,又与黄集、盐河、林集、花集一带刀会武装数千人进行决战,我军大获全胜。8月28日,八路军五纵队六八七团进驻朱坝西的龙王庙时,又与刀会发生了一次战斗,这时刀会已毫无士气,被我军迫击炮一轰即散。至此,为韩德勤利用的刀会终于被瓦解。淮宝地区遂为新四军、八路军所开辟的根据地。

新四军、八路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刀会之所以很快被瓦解,是党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更是党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首先,政治上宣传教育,是争取广大刀会群众的关键。正因为刀会中受蒙骗的群众居多数,而且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刀会,所以五支队领导人罗炳辉、张劲夫等同志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他们每到一

地总是要在激烈战斗的空隙召开当地群众会议,做刀会家属的工作,使群众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八路军有了正确的认识。其次,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新四军、八路军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执行者。群众见他们不扰乱百姓的生活,买卖公平,尊重妇女,完全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个样子,使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再则,打击反动刀会头子,争取多数刀会群众。在对待刀会时,罗炳辉同志作出了不主动出击,不打第一枪,不追逃跑会徒的规定,把反动头子与刀会会徒相区别,这对争取刀会群众很有效。第四,淮宝地下党组织,配合新四军开辟淮宝,带路送情报,瓦解刀会,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首先把岔河刀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党组织派党员吴锡武当保长,在保里成立小刀会,设堂子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原来是红军;小刀会红兜肚、红巾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使得岔河小刀会没有参与反对新四军开辟淮宝的行动。在刀会与新四军激烈战斗中,有的地下党员还编写顺口溜教小孩子唱。如:“小刀会,瞎胡闹,枪声响,刀一撻。刀枪不入谁个见,高粱地里睡大觉。小刀会,活受罪,枪一响,地下睡。刀枪不入是鬼话,赶快回家种庄稼。”这对刀会起到了一定的瓦解作用。第五,对刀会头子采取分化和区别对待的政策。一般说来刀会头子是比较顽固的,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建迷信之害也深,但总不是铁板一块。五支队领导同志对他们言辞恳切,晓以大义。同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指出他们的光明出路,有些刀会头子在新四军的感召下,转而同新四军、八路军一起抗日。

(作者单位:淮安市洪泽区党史办公室)

淮阴仁慈医院1948年大火前后

■ / 何永年



仁慈医院南大门,面对小市口街(原通京大道)
1914年10月仁慈医院揭牌仪式

淮阴城第二次解放前夕,1948年12月1日凌晨三点钟,坐落于清江浦东郊、由美国基督教教会创办的有五十多年历史的“仁慈医院”(医院病房大楼红色屋面上漆有白色“USA”,字很大,十分醒目,从空中俯瞰定会看清,为的昭示飞机不要在此丢炸弹。)失火了,医院中部西侧女病房楼首先起火,紧接着院内综合楼、男病房楼(都为三层楼),共一百多间房屋都相继烈燃熊熊,火光冲天,连同屋内家具等物品都焚烧干净。这场大火连续烧了约10个小时。

我家住在石码头街南段万字口旁边,这里是清江浦地势最高处,几与里运河南低洼处旗杆顶平齐,周边(应该是全市)没有一座高楼大

厦,对火场看得很清楚。

首先赶到火场附近的,是离得最近的位于越河街东段的济安水龙局。水龙(也称洋龙)沿着通京大道(后称小市口街)向北一路急驰,紧接着西长街水龙局也很快沿着东长街赶去,北门大桥口水龙局也已出动了。这时候仁慈医院北边尚没有和平路,有的是清康熙九年(1670)康熙皇帝亲自督促修筑的一条绵延很长、蜿蜒曲折的用以抵挡黄淮发大水的大土堆。仁慈医院大门朝南,直对小市口街。医院围墙周边散落的民居,没有后来那样密集。街道是很窄的石板路,因此水龙四只铁轮奔驰在车辙碾压形成的高凹不平的石板路上,发出的声响惊心动魄,传得很远。我父亲是西长街水龙局成员,负责背负帆布水龙带,这次他坚决不让我跟着举火球。一是失火场面太大,危险也会大;二是深夜天太冷,我尚小,只让我随母亲站在万字口远远观望。这时万字口蒋家绳店三楼上由西长街水龙局设置的火警大铜铃彻夜响个不停,几乎整个市区都能听到,令人毛骨悚然。有人上楼观望,我也拉住母亲奔上楼,朝东一望,火场似乎近在眼前,熊熊大火尽收眼底。

但是,所有前往救火的水龙及附近端着水盆水桶的群众,都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队挡得远远的,不许靠近,不准救火。这是怎么回事?

淮海战役激战犹酣之时,我苏北解放军一部,为了配合淮海战役,于11月下旬,迅速向两淮挺进,准备攻打被国民党军队盘踞的淮阴城、淮安城。国民党驻军知道形势不妙,末日来临,

准备逃跑,于是,逃跑之前进行疯狂的抢劫、烧杀。

11月30日下午,驻淮蒋军到医院交涉,要求院方把包括医院设备在内的物资全部运走。不一会,百十名国民党士兵开到医院开始戒严,医院里不准人员出入。留院人员都看出情况不对头,但都猜不透他们会使出什么花招。这时候医院全为华人——清江浦人。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华沦陷区的美国人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纷纷回国。1942年4月,院长钟爱华与其他美籍人员被迫回国,中国医生曹济生主持了医院工作。

原来,驻淮国民党军队绥靖司令部窥测到联合国大批救济物资存放仁慈医院。这时,国民党军来人到医院与院方有关人员交涉,先说要医院把物资全部转走,接着百十个士兵控制贮藏物资的房屋及医院内外,把所有人员召集起来,宣告:“你们这里有这么多物资,要立即运走,若运不走,我们就要毁坏了,不能留给共产党。”其实大批物资在极短时间内根本来不及转移,很明显,他们是想趁机大捞一把,借机抢运。于是,下令士兵把物资封起来进行清点,先还装模作样地开列清单,用木箱、纸箱包装,到晚上没有灯光,清单也不开了,他们就动手搬,到夜里索性抢开了,全部搬到室外,立马全都运走了。

12月1日凌晨3点,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派驻淮阴蒋军司令周岳,命令将仁慈医院的房屋,付之一炬,以此掩人耳目,使人不知这批大量财物是被人抢劫的还是被烧掉的。四面岗哨森严,不许任何人去救火,熊熊大火烧了约10个小时。周边群众,个个义愤填膺,不得靠近,敢怒而不敢言。

12月1日深夜,在大火焚烧的同时,还在仁慈医院东边小城隍庙的荒场上,枪杀了共产党干部许大中等十九人。同时在南门外,他们将捕捉来的无辜群众,强加通共的罪名,活埋了二三十人,造成了淮阴“一二·一”血案。2日上午,临逃离前,蒋军又在淮阴城内大肆公开抢劫,闹得鸡飞狗跳,神鬼不宁。人们看到,在万字口吴大昌商铺门口有几个国民党军队士兵坐在石阶



仁慈医院外景 1928年拍摄

上,神情萎靡不安,他们是在仁慈医院戒严、放火任务完成后,等待城里国民党军队集中后向淮安(现淮安区)逃窜的。有位老人朝他们嘲讽了一句:“噫,今天怎么不神气了?”这时候家家店铺紧闭。

医院房屋为起脊屋顶,屋面为美制优质瓦沟铁(又称瓦楞铁)铺设,经大火一烧,卷曲着落到地面,油漆烧黑、翘起,在火光中冒着浓浓的黑烟。

12月1日上午,未待大火熄灭,国民党军队撤走,医院留守的孙化民(后在市二院外科上班,笔者认识并熟悉)、陈再生(后在市城中医院上班)、王大铄、张芳水等几位医生来到医院南门外小市口街上。他们看到,附近老百姓看东西烧了可惜,便一哄而上,将尚未烧坏,尤其是南北两边宿舍区及东边黑热病区没有着火的物件,纷纷搬走,大火余生的物资,很快消失殆尽。2日下午四点钟解放军进城。后来,有关部门派人挨门逐户动员群众将东西陆续送还。

仁慈医院大批物资从哪里来的呢?内战期间,联合国在我国设置了多处救济机构,在清江浦中洲暨济庵设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处淮阴办事处”。木质牌子不大,挂在办事处大门口。办事处有数十间库房,堆满了物资。院子较大,停有四辆美制绿色十轮大货车,和我国产解放牌卡车相似。四辆大卡车有四位驾驶员,他们是张大鼻(名字不详),孙大庄人;杨金玉,市区人,解放后在马路头修自行车;丁奇,扬州人,夫妇俩,住万字口吴姓烟酒杂货店楼上;丁怀标,也住在吴姓店铺楼上,淮阴解放后前往



男病房---西南侧 1928年拍摄

南京继续开车。办事处每月按计划将救济物资送往四乡八集,救济内战中的灾民。大货车漆有联合国标志,运输途中国共两党武装部队不得袭击,否则违反国际公约。这些物资有衣服、被褥、药物、器材、粮食等,粮食中雪白花旗面粉,质地、口感很好,人们记忆犹新。所有物资都从水路运来,在中洲码头卸货。还有部分物资贮藏在鸡笼巷(后称基隆巷)5号美国传教士戴德明住宅内。仁慈医院贮存的大量物资就是在内战期间由救济处调运而来。

国民党残兵败将于2日上午弃城南逃。群众看到国民党末日临头,未战先溃狼狈不堪的景象,无不拍手称快。我军下午四时不战而进占淮阴,宣告了淮阴城第二次解放。其实,早在1948年7月间,我军转入大范围反攻,国民党淮阴城内守军拆民房、补城墙、筑碉堡,到处抓丁,妄图固守顽抗,闹得人心惶惶。仁慈医院无法再维持,遂于7月上旬迁往镇江,住在伯先路内地会,医院部分物资亦随之转移。淮阴仁慈医院仅留数人看守,关门停诊。

我军解放淮阴后,除留一部担任城防任务外,其余部队,在司令员赵海峰、副司令员吴大林的率领下,于3日拂晓前,向南追击逃敌。

12月2日上午,医院高子文、张奎一随着国民党汽车到达镇江,向原在淮阴仁慈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吴德珠小姐汇报了情况。吴小姐和高治平一起赶赴扬州,与国民党当局经过艰难交涉,终于同意归还部分被劫走的物资。在吴小

姐的主持下,谷懿之、高治平、高子文等人在镇江筹备了几个月,于1949年春天在伯先路内地会重新开诊,负责人是谷懿之、高治平,医院仍叫仁慈医院。

1950年,在镇江的美国人经我国政府批准回国。1951年6月16日,仁慈医院人员从镇江起锚,19日抵淮阴,淮阴地区人民政府接收了仁慈医院在镇江的全部人员和物资,与我地方政府办的人民医院合并。

随着行政区域划分,院名数次变更。1949年1月4日“两淮市医院”开诊。1949年3月,两淮市医院并入淮阴专署淮海人民医院,仍名为“淮海人民医院”。1949年11月1日,淮海人民医院更名为“苏北淮阴区中心卫生院”。1953年7月,更名为“淮阴专区中心卫生院”。1964年8月,更名为“清江市人民医院”。1983年3月,更名为“淮阴市第二人民医院”。2001年2月,更名为“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同时挂牌“仁慈医院”。

(本文得到八十七岁高龄的庞声才,及年近八十的吴和年二位老人热忱帮助,谨致衷心感谢。庞老、吴老与笔者当年都住在万字口附近,为近邻)

(作者系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退休干部)

乐走“南京路”

■ / 蒋长明

我这里说的“南京路”，既不是大上海的南京路，也不是古淮安的南京路，而是从淮安到南京的这条路——一头连着省城，一端通达本市，大名叫“宁淮路”，本地人习惯说“上南京”。凡是常出行的人，相信不会少走这条路，我跟它似特别有缘，几十年来一直在这条路上奔波，尝尽了酸甜苦辣，领略了心旷神怡，目睹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南京路”脱胎换骨的大变化。

早年我当兵驻扎南京，部队在那头，家在这头，探亲公出，不时会在这条路上奔走；后来在宁工作，“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穷窝窝”，逢年过节，星期假日，回家当然是必须的；又后来结婚成家，夫妻都在淮安供职，家自然也在这里，恰好，那口子又是南京人氏，注定还要继续在这条路上颠簸；再后来，儿子学校毕业在南京就业定居，这个“你懂的！”真是逼着我“一条道上走到底”，要经常去看望儿子一家。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这条路是越走越宽敞，越走越欢畅，要是有些日子不光顾，就像少做了点什么似的，心中空落落的。

路还是这条路，前后变化却是太大了。记得早些年，路差车破票难买，上南京不如今出国方便，烦得头都大了，视为畏途。一票难求是常态，起早贪黑排队买票，四块四毛五一张票，只有到中央门一个点。更糟糕的是在路上，那简直是种磨难，洪泽湖大堤上九九八十一一个弯，那真比考驾照还有难度，尤其会车总让人胆战心惊，逼仄的路面要小心翼翼防止刮碰，反正每次路经那里都会看到堤坡下的树丛中躺着出事的车辆，要是遇到雨雾雪冻天气，坡下躺的车子会更多。当然，人员伤亡也不可避免。好在那时车子很少，

要是像时下车流如潮，更无法通行。

这条路上的第二个节点就是天长县境内的汭涧那一段，路况差加上人为干扰，经常将车子堵在那里。有次我们坐的大客车在泥沛被当地人拦下，说把他们的路压坏了，要“买路钱”，从中午纠缠到天黑6个多小时才得以脱身。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风行。”所以，那时上了路也难说何时到达，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200公里路程走4个多种头，算是快的，朝发夕至，走上一整天十来个钟头也是家常便饭，说是“蜗行”恰如其分，常常是“起五更上扬州，顶天亮还在家门口。”

好在改革开放使这条路旧貌换新颜，让人亢奋。先是修了一级公路，中间有隔离带，两边设护栏，行车不受干扰，远离了洪泽湖大堤上那条难行走的“羊肠小道”，通车时很多驾驶员欢呼雀跃，弹冠相庆，有种苦尽甘来的快感。宁淮之间只有两个多小时车程，坐早班车到南京，不影响办事，逛街游玩购物后傍晚再跟车返回，十分便捷。如自驾时间更充裕。后来又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路况更好，行车更爽，途中有配套的服务区，供应茶水、食品、提供方便，不像以前路上内急会很尴尬。到南京有北站、红山、南站可选择就近下车，到淮安也有南站、总站、北站三处停靠，既快捷又方便。自驾更是一种享受，可以饱览沿途江淮大地的旖旎风光。以前是一路疲惫一路烦，如今是一路欢畅一路歌。

一叶知秋。一滴水见大海。改革开放，大路朝天。乐走“南京路”，越走越快活。

（作者系原清浦区区志办主任）

老澡堂——幸福池

■ / 郭应昭



清江浦城内城外曾有几个老澡堂。如东大街上纪家楼斜对面的幸福池、花街南面牛行街的明泉浴室、东大街

堂子巷头的女子浴室(解放前没有女浴室,是解放后由原寿泉浴室改的)、西大街上草市口东面的大新池、北门西后街里面的荷花池(日伪时期,日本婆子曾闯进洗澡,吓坏了清江浦的一批光腚男人)、越河街与录事巷交叉口的天泉浴室。东长街与铁篦巷交接处原还有一个叫南泉浴室,但在日伪时期被改为大烟馆。

这些老澡堂离现在最少的也有60年以上历史。老澡堂都是开在老清江浦人集中居住地方的青砖小瓦的老房子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运动使清江浦老澡堂得到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国营。给浴池烧水的、打毛巾把子的、擦背的都成了全民企业的职工。

我洗过幸福池、大新池、荷花池,多次经过堂子巷女子浴室门口,对澡堂有一种特殊的情愫。那些年,看到趋之若鹜的带着换身衣服和肥皂、洗发水的浴客,常会想,生活中没有澡堂可怎么好?

小时候随父亲洗澡最多的澡堂是幸福池。幸福池有两道门,第一道大门朝南,紧贴东大街街边,门楣上有凹下去的“幸福池”三字,向北经

过一条20米长的铺着青石板的甬道,进入挂着厚布帘的二道门才到澡堂营业厅,营业厅是老式建筑,有四梁八柱。进了二道门,便是卖澡牌的高约抵大人肚脐眼上的褚色木制“L”形柜台,澡牌是竹子做的。

从幸福池的柜台向北走,再向左拐进去是最便宜的客厅,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每客8分钱;与柜台相对,二道门左边有花格玻璃间隔的厅是1毛一人。其实这两个厅座位都是木头平板且没有靠背不足1米宽的长通铺。两个厅设施没有明显区别,区别应是一个在浴池的南边、一个在浴池的北面而已。在冬天,北边房间比南面房间温度低一些。浴客带有贵重物品的外套一般都由服务员用长竹竿衣叉挂到所在位置上方的衣钩上,其他衣服则包成团放在通铺上,鞋子放在座位下的鞋柜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幸福池在南厅西头向北新建了一个带单独衣柜可供20多名浴客躺下休息的雅座厅,每客一毛四。

不同的花费,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北厅的服务员一般只有一人,南厅服务员一般是两人,雅厅服务员一人。北厅浴客上来后,热毛巾把子一般给一块,南厅热毛巾把子一次给两块,一块给浴客自己揩脸,一块由服务员帮浴客抹背上的汗水。雅厅服务就更



周到了,热毛巾随要随给,有免费白开水供应,当然如果沏一壶绿茶要收费1毛钱。三个厅都有青萝卜卖,5分一个。

服务员跟很多浴客都熟,见面亲切地互相招呼:“来了?”“嗯,来了。”脱衣时和穿好衣服后,嗜烟的浴客常会从衣服里摸出香烟敬给服务员,而服务员则会殷勤地用打火机给浴客把烟点上。一会儿,香烟味混合水蒸汽向四下弥散开去……笑眯眯的服务员耳朵上经常夹着一支或两支香烟。

闲下来的时候,服务员会像“二人转”那样转动食指顶住的毛巾。哪个浴客要热毛巾,服务员会把毛巾在热水桶里浸半透拧干后,手一甩,毛巾便会旋转到几米外的浴客手中。

浴池东、西各有一扇厚重木门,东门进南厅和雅厅浴客,西门进北厅浴客。厚木门中间被下端坠着重物的一根皮条压住,皮条上端固定在门楣上,在重物的坠力下,门被推(拉)开后会自动关上。

幸福池的浴池面积不太大,一次能进四五十人洗澡。它有大理石镶嵌的池子和大理石砌的浴池间四周的墙壁,浴池上方弧顶有一块二尺见方的玻璃天窗透光。天黑后,南墙中部上端嵌有一块防水玻璃窗,里面有一只白炽灯泡给浴池照明。浴池间地面铺的是青石板。浴客进浴池间前要把穿的木屐脱在浴池间门外。

没有自来水时,每天上午9点钟左右,三五名挑水工就要把浴池所需要的水挑好。他们打着号子走着有节奏的步子从里运河挑水通过青石板甬道,走进浴池间,把两个木水桶的河水一左一右地直接倒入池中。浴池分烫水池和泡澡池。烫水池在北边,下面是两口大铁锅,大铁锅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煤炭火。烫水池与泡澡池温度最高相差20-30摄氏度,故烫水池上必须盖有两块专制的厚木小方块花格,以防浴客滑到烫水池中。有浴客喜欢睡在花格上(蒸),有浴客喜欢用毛巾从花格中蘸高温水呲牙咧嘴地烫湿气脚,嘴里还不住发出嘘嘘声……有一年竟发生过一名浴客掉到烫水池中而被烫伤的事情。

烫水池与泡澡池之间有一块一尺宽的活动木板可插到池底以控制烫水流动。整池水加温

时将木板抽开,泡澡池达到40度时,再把木板插上。有一块一尺多宽三寸厚的长木板搭嵌在泡澡池的东、西两边,把泡澡池从中间分开,靠近烫水池的一半池水较另一半温度要高点,长木板既提示了水温又增加了浴客坐的地方。

浴池室内热气蒸腾,三米外看不清人的脸,朦朦胧胧中,看到浴客姿态各异。有闭着眼懒懒地泡在水里舒服的,有坐在池边和木板上聊天的,有自己擦灰的,有互相擦灰的,有在池中洗头的,有用丝瓜瓢打肥皂的……在那个年代,想讲究也讲究不起来,泡、搓、洗都在一个池子中,池水、汗水、肥皂水、洗发水都混在一起……每天晚7点不到,池子里的水就呈牛奶色。每次洗澡去迟了,洗不到好水,我父亲总会说:“脏水不脏人。”

孩子喜欢在水中嬉闹。有的捏住自己鼻子比吃猛子憋气,有的互相打水仗,溅起的池水迷住别人的眼、钻进别人的耳洞,就会遭到大人们的呵斥。

有的大人喜欢逗三四岁的孩子玩。他们捉住小男孩下面小玩意笑眯眯问:“这是什么?”不说不放手,有的小孩怯怯地在喉咙里回答,而有的小孩不怕人,大声地说:“小鸡!”惹得浴客们哈哈大笑。

擦背工基本闲不下来,有许多浴客是他们老主顾。由于浴池间空间小,擦灰的地点,有的在池边,有的在浴池间门外长条木凳上。浴客多的时候,池中,身子挤着身子,池边,屁股挨着屁股。有的浴客没地方坐,只好用两手撑墙站着让擦背工擦。擦背牌子一般是买票时一起买的,也有擦好后补的,1毛一人。

在幸福池二道门外,每天都有妈妈或奶奶等候洗澡出来的婴儿。婴儿由父亲或爹爹(爷爷)带下池子去洗,孩子哇哇的啼哭声往往给浴池内平添几分温馨和柔情……给小孩洗好后,大人以防孩子脱手而用毛巾裹住婴儿出池。上来后,大人只披浴巾或光着身子抓紧给婴儿穿好衣服。由于出去不方便,有的浴客便请服务员把婴儿抱到二道门外交到婴儿母亲或奶奶的手中。交接时,接孩子的人要报出婴儿父亲或爹爹的名字才行。

改革开放后淮安市收藏市场的兴起与发展

■ / 胡彬 季玉华 王学海

改革开放后,淮安人民生活逐步提高,解决了吃饭、穿衣、住房等基本问题,人们业余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有些人喜欢打麻将、攒蛋、垂钓、广场舞,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收藏,热爱收藏,研究收藏。因此,淮安收藏市场应运而生。淮安市收藏市场从无到有,从有到大,走过三十余年岁月,既方便了广大藏家购藏与交换藏品,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藏友,研究交流收藏知识,同时,又解决了当时部分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一举两得。如今淮安古玩花鸟市场,名声鹊起,享誉全国,已经成为全国广大收藏爱好者好去处。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笔者根据自己在收藏市场亲历、亲见、亲闻,作一点回顾,与大家分享。

一、收藏市场兴起

淮安市收藏历史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初期



咸丰当千钱拓片

就有许多集邮藏家和爱好者,周末在西大街老邮电局门口交换藏品。大约二三十人,有两三个地摊,自娱自乐,互通有无,以柏姓老先生摆地摊最久。1982年在市区石码头街,有位林姓退休老先生开了一家古旧书店,名曰“古韵轩”,以经营旧书为主,兼收和买卖古旧书画、古陶瓷

1968年,我插队农村劳动后,在洪泽县公河公社小澡堂洗过一回澡,现在想来那场景着实让人难堪。公河街上小澡堂的热水是用一口铁锅烧的,烧的是稻草,不能像煤炭那样熬火保温,几个知青挤坐在脚踝深的水里,连身子都难淋湿。但这在当时的农村已够文明的了。

每次从农村回来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好好洗上一把澡。碰巧会约到下放农村老家但常回来的男同学蒋清一起去幸福池雅座洗澡,这是我们很开心的事。在那个年代,一个月洗一把澡就不错了,两人一把澡资就是2斤平价大米的开销。到澡堂泡一泡,劳累、苦恼一时全消,顿

觉浑身轻松。

在幸福池雅厅做服务员的王大爷是清中女同学王素云的父亲,我们每次去洗澡,他对我们都热情有加,让我们对老澡堂幸福池有更多的记忆。在这里,有王大爷慈父般的笑脸和不时送过来的热毛巾,还在有毛巾被盖的铺上躺一躺,喝上两杯茶,吃上两瓣青萝卜,随便东拉西扯,不时闻着沐浴后自己的体香……感到生活真是美好!

(作者系淮安市清江浦区政府办退休公务员)

等,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市区第一家经营“古旧书私营店”,笔者曾经在“古韵轩”购藏了嘉庆十四年进士麟庆(道光年间官至江南河道总督)一部古籍《鸿雪因缘图记》残本,此书为其生平涉历之事,对研究我国清代洪泽湖、淮河和大运河水利史有重要历史价值,可以说是笔者第一部古籍藏书。早在1985左右,市区大闸口若飞桥两侧,有二三十个卖旧货商品摊位。其中有耿姓老人等几个摊位买卖古钱币,周末常有藏家去逛旧货市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古钱币交换小市场,偶尔也会购到古陶瓷藏品。记得1997年左右,有位赵姓老板在大闸口收购到一枚十分罕见,而又是孤品宝苏咸丰当千大铜钱。此钱就是咸丰年间清江浦铜元局铸造的珍品,为样钱,时轰动江苏收藏界。没多久就转让给上海藏家。十年后,上海藏家以百万元转让给扬州藏家。宝苏咸丰当千铜钱现身,是江苏收藏界一大新闻,足以载入史册。

当时收藏主力军是主要集邮爱好者,也有收藏古钱币和烟标的藏家,收藏书画、古籍善本和古陶瓷者寥寥无几,凤毛麟角。1991年初,市区有石姓和傅姓老板,在西大街开起了淮安市第一家古玩店,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名曰“飞龙古玩钱币商店”。笔者曾经用800元高价,购得清代学者、书画家陈曼生榉木八字对联一副,花了笔者一年多奖金,在当年可谓是巨资购藏,至今记忆犹新。

西大街和大闸口邮票钱币古玩市场形成,应该说这是淮安市收藏市场雏形和基础,原淮阴地区其他县区收藏市场亦是如此,只是规模更小,地点不同罢了。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藏队伍不断壮大,有千余人之多。既有平民百姓,也有机关公务人员加入。西大街邮局小市场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同时也影响到西大街居民交通出行。于是,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的清浦区政府有关单位规划,将收藏市场迁移至华城小区东侧(水门桥下)。当时内有门面房十余间,用于开设古玩店,多数是下岗职工参与经营,自食其力。笔者曾经在此处古玩城购得清朝著名军事家、书画家彭玉麟纸本七字对联一副,如获至宝,收藏至今。华

城古玩市场因为地点选择较好,位于闹市区,又是老居民区,古玩店老板既能卖古玩,也可以收购到当地居民家中藏的古玩,价格比较低廉,故买卖尚可。二三年之后又迁址清晏园东大门南侧,仍有十余家古玩店开张,比较有名气的如“名家画廊”,主要经营省内和市区古今名人书画,生意红极一时。记得当时画廊中有周总理外祖父万青选一幅画并题了一首诗,非常少见,由于囊中羞涩,没有买下,至今后悔不已。

九十年代市区城市建设飞跃发展,道路拓宽,老城区改造,商品房开发如雨后春笋,于是,拆迁旧房无数。市区居民家中一些旧家具、古陶瓷、古今书籍、古旧书画,走向废品收购站或被古玩商淘得,转而又卖给藏家获利。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讲,古玩商也起到了保护一部分文物古玩作用。对于藏家而言,又多了许多收藏渠道,丰富了藏品。笔者曾经淘得民族英雄、淮扬镇总兵欧阳利剑书法四条屏,就是拆迁户当废品卖到旧书摊上,转而被古玩商购得,几经辗转,几易其手,最后又被笔者购藏。由于时代久远,买到的四条屏书法,破烂不堪,笔者拿到市区“守文斋装裱店”重新揭裱,除霉去脏,焕然一新。笔者在不经意之间,保护了一位曾经客居淮安历史名人书画。

大约1997年,当时清河区政府有关单位利用淮安市大修厂空地,建起来淮安市古玩花鸟市场,占地面积有百余亩。里面搭起简易柜台,以及防晒、防雨简易房,规模空前。每到周末摆地摊人和逛市场的人络绎不绝,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于是,古玩店纷纷迁址到大修厂古玩花鸟市场,时有二十余家。不但解决闲置空地问题,而且解决很多人就业问题,周末市民又多了逛市场淘宝好去处,一举三得。2000年左右,大修厂一带搞房地产开发,古玩花鸟市场无奈又搬迁至大闸口边的花街新建小区楼下,由于处于室内,场地规模缩小,经营不景气,加之整天没有阳光,通风状况不佳,摆地摊做古玩生意之人,少之又少,不及从前。笔者曾经在大闸口徐姓古玩店,以3800元购藏一件唐代寿州窑黄釉执壶,又以1000余元购藏一件宋代邢窑系白釉执壶,均完整无缺,现在已经捐赠给洪泽湖博物

馆收藏。2003年淮安市区文庙古玩市场开发成功,有大量的闲置门面房不好卖,不好租。时清浦区有关单位和开发商很是着急,便与古玩商协商,以免一年房租为条件,吸引古玩店老板迁址文庙开店。由于条件优惠,古玩商纷纷搬迁至文庙。大闸口古玩市场人去楼空,门前冷落车马稀。而现在文庙古玩花鸟市场,每逢周末开古玩店以及与收藏有关的行业有几百家,南来北往,门庭若市,熙熙攘攘,像过年似的一派繁荣热闹景象。

古人云,乱世藏金银,盛世藏古董。如今,人们从缺吃少穿艰难困苦走出,生活条件日益改善,有了余钱买古玩,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增长文化知识,提高欣赏能力,这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一大进步。

二、收藏队伍发展

淮安市收藏家队伍主要有集邮协会、收藏家协会、钱币研究会、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淮安市分会等组成。淮安市集邮协会和收藏家协会是主力军。据统计,目前有几千人之多。收藏家协会有许多藏家,是从收藏邮票或古钱币发展而来,目前形成众多收藏专题,精彩纷呈。

邮票专题有:改革开放专题、科学技术专题、历史文化名人专题等。书画收藏专题有:扇面专题、淮安历史文化名人(乡贤)书画专题、清代学者书画专题、当代书画家专题等。陶瓷收藏专题有:高古陶瓷专题、明清瓷器专题、青花瓷器专题、紫砂壶专题、明清花盆专题、古陶瓷片专题等。古钱币专题有:纪念币专题、古银币专题、纸币专题、古铜元专题、古方孔钱专题等。杂项专题收藏有:古铜镜专题、古铜锁专题、古铜帐钩专题、古铜炉专题等。图书类专题有:淮安地方文史资料、红色藏书、小人书、工具书等,门类众多,颇有淮安地方收藏特色。

淮安有了古玩市场,本地藏家周末有了淘宝好去处,外地的藏家也常来光顾,推动了淮安收藏市场初步繁荣,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解决了一部分下岗职工再就业。同时,也造就淮安市藏家队伍崛起,2003年9月在各方推动下,由市文化局牵头,成立了“淮安市收藏家协会”,从此收藏家有了比较规范管理的社会团体组织。

收藏队伍的分工和崛起,带来了古玩市场分工,有开钱币商店的,比较有名气的有“楚侯邮社”,以经营邮票和古银币见长。有开古陶瓷店的,名曰“翰古轩”,店主以经营古陶瓷器、杂项见长。有开古书画店的,比较有名气的是“山蒲草堂”“画缘斋”等,店主每年经营数额较大,以经营淮安历史名人书画见长。目前,因为淮安市有专题收藏乡贤书画群体,拥有一定的市场,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由于书画店主不断推介宣传,因此,淮安历史名人书画价格一路攀高,从某种程度讲,也提高了淮安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认可度。由于收藏书画队伍扩大,分工明确,又有人开设古旧书画装裱店的,比较有名气的是“守文斋”等。店主手艺精湛,修旧如旧,为淮安市装裱古旧书画非遗传承人。此外,因为淮安及毗邻省、市、县有大量收藏瓷片藏家队伍,有高姓修复师在文庙又开设了“延庆堂古陶瓷修复工作室”,专门为广大瓷片收藏家修复古代残缺陶瓷器。由于其工艺精湛,修旧如旧,变废为宝,受到广大藏家称道。

淮安收藏市场繁荣,拉动了有关产业发展,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目前文庙古玩市场有商户近600家,其中古玩、玉器、装裱、文房用品、古今书画等店有近60家。这些店主大约有一半是外地客商,他们的经营满足了人民群众需求,丰富了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2003年之后,文庙古玩市场蓬勃发展,逐步解决了开发商门面房滞销问题,救活了开发商。南来北往游客不断增加,做生意人之间互动,以及藏家之间互动,又拉动了淮安市旅游业发展,成为淮安市旅游市场新的增长点。

(作者单位:淮安市收藏家协会)

《阳光漫忆》(王庆元 著)序一

心生莲花开 笔墨抒情怀

■ / 周毅之



阳光漫忆

有一次在路上,庆元同志和我说,当他在回忆美好的往事和落笔行文中,常常会有“心生莲花”的感觉。于是我就想起佛家有言,“花开见佛性”,心中生此“觉悟莲花”。《阳光漫忆》以笔墨抒情怀,其志则在一吐自家内心所存的“觉悟莲花”。

打开《阳光漫忆》,页中风光无限,美不胜收。那些美丽如画的景色,新鲜有趣的故事,读来让人回味。作者以文字承载思想,融铸了他的情与思,充满了个人体验。那些五味陈杂的漫忆和行走间看山听水的感受,分明蕴含着昨日的欣慰与惆怅,今日的美好与寻觅,明日的期盼与梦想。

这本散文集最为动人的部分,当属回首岁月的内容。《我的童年》一、二两篇,既把童年苦涩的经历写得深刻而沉重,又对童年的乐趣,写得情意绵绵,让人能找到乡愁般的感觉。《我的当兵经历》《难忘五连》,不论是当过兵的,还是

没当过兵的,读来都会为那份青春岁月里的艰难付出和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而感动。《回首老三届》,深刻地描述了这代人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其抒发的虽然是这代人的胸臆之痛,但让人清晰地看到,这代人虽是历经磨难,万水千山,但眼中还有热泪。同时也让人领悟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或许是微不足道的被裹挟者,而每个普通人,也是历史的记录者、创造者,其个人与国家是同呼吸共命运的。那些源自回顾人生历程时升华起的生命感悟,那些拥有生活灵性的文字,总是鲜活且令人动容。

这本散文集最为见情怀部分是对大自然的吟唱。那种对自然的深情,对生命的敬畏,对美的赞赏一览无遗。作者崇尚自然美,而且善悟自然之道。他以胸怀澄澈虚静空明的心境解悟山水,对话自然,抒发情怀。无论是霞落云飞深处的《永久的敦煌》,还是大漠落日残垣中的《交河故城》;无论是沉寂在茫茫沙丘中那一勺《不浊不涸月牙泉》,还是《一朵盛开在长白山之巅的雪莲花》;无论是《寻访桃花源》,还是《走进贺兰山》;无论是《聆听坎布拉》,还是《一见钟情青海湖》等等,都意在捕捉山水优美和谐的生活情趣,恬静清逸的诗美意境,体现了作者对平凡之美、质朴之美的眷恋和热爱自然、热爱故土、热爱生活的情思,同时也倾注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深情,对天地造化的感悟与感恩。

这本散文集中,特别能够引人注目和沉思的是它的情中之理。在《传统年味》《良风民俗话清明》《运城归来思关羽》《站在大足石刻前》《热血铸就歌乐山》等篇中,作者着力开掘我们

民族传统文化中精神坚守的生命动力,展示人文精神的艰难续存,更让人思考当今科技蒸蒸日上、生活富裕之时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塑以及精神引领的重要。可以看出,作者无论是在看山听水,还是品读欣赏人文景观,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多了一份哲理的思考。《一朵盛开在长白山之巅的雪莲花》中他写道:“站在天池边,仰望苍穹中无尽的辽阔,不由使我想到了原始、原生态。原,有着哲学的深奥,直入事物的本源;原,方显初始,方显圣洁;原,既是布满玄机的原初,又有含寓存在的来由和存在的理由;原,是最为朴素的真诚,又是可以永久信赖的真理;原,既激发人们窥探的热情,更坚定人们抱本守初找回本真的信念。”《诗情与梦境驻足的九寨》中他思考:“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自然才能给人以清净和美丽。从本质上讲,一切天上的雾霭,其实都是人类心灵雾霭的折射。只有当人类的心灵不再为尘垢所蒙蔽时,那一片翠绿的森林才会存在,那一片湛蓝湛蓝的天空才会对人类尽情地开放。”《寻根敬祖黄帝陵》中他说,“在中华民族一代一代人的心中,生生不灭,千古传颂的能有几人?那高高耸立在人们心中的黄帝陵,那千古传颂的黄帝故事昭示着后人:政德在民,民心是天。德存德失,载舟覆舟,高山尧尧,圣者在此;大河滔滔,逝者如斯;往事历历,天地可鉴。”《长城之思》中他发出这样的感慨:“面对这古老的长城,面对厚重的历史,人们的敬畏与崇拜太少太少。而今欲望无限扩张,历史成为被遗忘的过往。有谁会站在长城脚下,仰视一砖一石垒起的铜墙铁壁,在时光的遗韵中缅怀赞许那些用汗水、泪水、鲜血,或是用生命来创造历史的平凡人呢?”《寻访桃花源》中他顿悟:“无论如何,于喧嚣中,将一颗平常心安顿在自足自悦之中才品得出生活的真味。”《忆往感怀》中,他对生活的觉悟是:“现实中,我们有一百个为名为利忙碌的理由,却不愿为一首诗、一本书、一杯茶,或一曲轻音乐找一个理由。‘忙’是由‘心’和‘亡’组成,忙多了就会失去‘心’……其实闲逸之心只和灵魂有关,与权力金钱无关。”《永久的敦煌》中他感慨:“世上的万物,但凡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或神奇或辉煌,大

都与精神意识有关……精神才是最有价值的传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万物速朽,而精神永在。精神生命比物质铸造的青铜器更长久”……从这些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作者以悲悯之心关心苍生大地,对人间尚存的种种善种种美,予以考察、解读、思考和探究。同时,不少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也进入了关注的视野,此中的贬斥和倡导,源于对传统文化中精华的深刻认识,是从安身立命的初心中,发现了对于当下生活具有借鉴乃至警示作用的所思所感。读了这些文字,会让人萌生发自心底的触动和深思。

《阳光漫忆》虽“漫”而有凝聚,是“忆”而有新见,文笔朴实中透着深情。“情由物迁,辞以情发”,这是作者由内心深处涌到笔端的情感,心生莲花开,情由自然来。这种情感首先是从书写对象而生,而后是对文字铺陈的把握。作者的这种深情,是泛存的,又是具体的。他把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对人民、对家乡、对战友情感的深切体悟,灌注到文字当中去,把酣畅的情感和激情的文字糅合在一起,于质朴晓畅中寓婉转摇曳之美,达到了情与理的交融、诗与思的结合。

散文相对其他文学门类,距离作者的本心最近。它提供了自我对话的栖息之所,让人摆脱庸常,明白生活不止有苟且。它是人生境界的展示,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与审美情趣的坦陈。同时,也是影响世道人心,通达美丽人生的重要桥梁。万卷万里,道不远人,漂泊行吟,文章兴盛,从中尽可于自然平凡中跳将出来,打探出朴素道理,浪漫情怀,《阳光漫忆》就是这样。因此这是一本能让人读出生活味道的解味之书。

我和作者庆元同志是多年相知相识的老朋友。我们是同年生,同在省级机关工作,同在一座办公楼办公,同年退休后,又同在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共事至今。他诚恳热情,朴实直率,善良敦厚,抱道不屈,在俗世里执着于精神的坚守,这些阳光的品性实属人生的可仰之处。由于心存阳光,加之其难得的人生阅历,以及勤读善思,近十余年来,他先后出版了《阳光人生》《阳

大闸蟹：下一张给世界的中国名片

■ / 钱仓水

大家知道，茶叶（及其冲泡的茶汤），大豆（及其制成的豆腐、豆浆）等，早已成为给世界的一张又一张中国名片，现今风靡全球。那么，下一张名片是什么呢？最有潜质的当属大闸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欧美各国（因为受到历史上宗教观念的支配，直至今天许多人是不吃蟹的）以及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喜爱它的。为什么呢？



光信访》《阳光随笔》等三本著作，颇受社会好评。退休之后，庆元同志又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写了这本《阳光漫忆》，用这些心灵的文字感慨生活的本真，引导我们向人生和大自然的美丽睁开眼睛。

纵观庆元同志阳光系列著作，如果说有一个“中心思想”的话，我认为应该是他一直以关注世道人心的悲悯情怀，品尝人生经历中的酸甜苦辣，思量人情世故里的往来。用真诚的心灵鉴赏品味，思索大自然的美丽、意蕴，在情怀、人品、境界、审美、修养诸方面，给人以正能量的、阳光的、励志的精神养分和精神坚守。让人在世俗里，从飘忽的情感中触摸到灵魂的真实状态，企盼人们拥有一个有人文情怀，有慈悲大爱，有审美情趣，有宽度厚度，有包容涵养的阳光人生。

“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说一个人经历了沧桑，老了，写文章不是要去追求什么，或赶什么样的时髦时尚，或去代人之言，而是书写自己的

心情，抒发自己的情怀。一个有灵魂的人可以在文章中找到自己。一个人的爱憎好恶，在行文中能传达他的内心。可以看出，这本书中的字句是从作者心底流淌出来的，并汇成一泓洒满阳光的清泉。更可看出，作者向我们敞开了心扉，把他最坦诚的独白呈现给我们。书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没有什么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但能使人看见作者那颗纯净善良阳光般的心。

我想，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人，一个对优秀传统文化坚守的人，一个行满天下的人，一个把生命融于自然的人，他的人生体悟，必是能启迪人心的。

谨以此为序。

2018年6月3日于南京

（作者系江苏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群众》杂志社原总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原副主席）

我国是大闸蟹的原生地。大闸蟹,或称河蟹、湖蟹、毛蟹、稻蟹等,动物学上称为中华绒螯蟹,因为造物主独独恩赐给我国大众而且两只大螯上布满绒毛而命名。它是洄游性动物,浅海里繁殖,淡水里成长,个体较大,一只三五两乃至更大,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格外情趣。大闸蟹先侨居到朝鲜半岛,上世纪三十年代又被带到欧洲,包括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然而它的祖籍永远是中国。

我国大闸蟹的资源丰饶。原先我国境内,大闸蟹的自然资源分布很广,北自辽宁,南至福建,西及湖北、湖南,都有它的踪迹。丰饶到什么程度?许多地方,遍布田野,大肆咬噬稻谷,形成了灾害。近数十年,随着部分自然资源的枯竭,人工养殖崛起,分布更广,连新疆、台湾等地都有了产出,成了我国一种最大宗最有经济价值的水产品。

我国百姓多半爱吃大闸蟹。《红楼梦》里说:在大观园里,“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这是一个微观的说法,扩大而言,今天多一半中国人爱吃大闸蟹。从历史记载看,毕卓、杨广、钱昆、苏轼、陆游、徐渭、张岱、李渔、张问陶、李瑞清、齐白石、鲁迅……或赞赏、或迷恋、或嗜好乃至饕餮,而且,经过自唐至今的积淀,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吃螃蟹”,已成了百姓的习俗。产蟹地区的人离乡后大闸蟹成了永远的乡愁,非产蟹地区的人吃了后便成了永远的怀念。

大闸蟹是一种营养而鲜美的食物。它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钙、磷、铁、硒、维生素A、核黄素、尼克酸等都很丰富,总体上超过鱼、超过虾、超过鳖,好多成分还遥遥领先,而且容易为人体吸收,能使人充满活力并促进智慧。它有充沛的呈味物质,口感又鲜又甜,又嫩又香,吴语区的人说:吃了大闸蟹,鲜美得眼眉毛都要蜕光哉!何况,蟹黄如金,蟹膏如玉,膜黑如钨,肉白如璧,锦绣似地灿烂,所以自古就被中国人视为“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的食物。

大闸蟹是一种最有情趣的食物。世界上的蟹类多达数千种,唯独大闸蟹不大不小,一只三五两上下,一顿吃个二三只,适中,恰好。大闸蟹

有各种各样吃法,最普通又最能吃出本味的是用鲜活的整只蒸煮了吃。如此,你得具备知识,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得掌握程序,什么先吃什么后吃;你得知道方法,吃到什么部位怎么吃;自任其劳,无形中培育了探求和缜密的性格,由劳致乐,像亲手弹奏了一首抑扬顿挫的食曲。另外,吃蟹时或吃蟹后还可以穿插捉拿法海和尚、寻找六角虫、拼装蟹蝴蝶、用戥子秤壳比赛谁吃得干净等余兴,给人无限情趣。

大闸蟹是一种要用八种工具吃的食物。八种工具指的是帚子、钩子、扒子、钎子、刀子、锤子、罇子、勺子,或铜或银制成,美观,光泽,精巧,玲珑,吃蟹的时候交替使用,壳无余肉,文明雅致。此具初载于陈少海《红楼复梦》第三十二回,距今已有200多年,始终流传采用。老天独独赐给了中国人一份“薄诸般之海错,鄙一切之山珍”的大闸蟹,中国人又心灵手巧地制作了“蟹八件”来吃它,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食具文化的一个极致。

大闸蟹是一种富含文化的食物。中国人认识和食用大闸蟹少说也有三千多年,创造,积累,汇聚,在它身上堆足堆满了文化,包括源话、喻说、咏唱、散文、故事、图画、捕捉、吃法、医药等等,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仅就源话而言,它为什么横爬?它背壳上为什么有个牛脚印?它大螯上为什么长满绒毛?它贴壳内壁处为什么有一层黑膜?它背壳里为什么躲着法海和尚?它心腹中怎么有只六角虫?……一一都头头是道,一一都妙趣横生。

由上可见,大闸蟹是一种具有中国标志、中国风味的食物,散发着中华文明的气息,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为物质与文化统一的复合体,故而现今应该未雨绸缪,超前准备,向世界发出继茶叶等之后的又一张中国食物和中国文化的名片。进而还可以酝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中国空缺的又一件与饮食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系原淮阴师专副校长)



吴氏的前后两个“三让王”

■ / 吴绪略

吴族的祠堂都以“三让堂”“至德堂”“延陵堂”等作为堂号。过去在很多吴人的堂上,都写着“至德世家”“延陵世第”,等等;每到春节,有的人家大门上总写有“三让家声,延陵世泽”“世家第一,至德让三”“延陵世泽,梅里家声”这样的春联,一看就知道这是吴氏传人的家园。

而这样的堂号,是与吴氏两位先哲圣贤吴太伯和吴季扎息息相关——先后两次“三让王”。千百年来,太伯奔吴以“让国”的事迹一直在史学界中流传着。而太伯奔吴以“让国”的基本事实,则由太史公司马迁确凿地记述在《史记》中。

一、吴太伯的“三让王”(前)

1. 一让,走吴山

传说周文王姬昌出生前有祥瑞之兆,生下来就聪明异常,颇有伟人气质,深得祖父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宠爱。太王有心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以便以后能传位给姬昌。但是按照当时氏族的传统,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姬昌的父亲季历排行老三,自然没有资格承嗣王位。古公亶父既不愿违背废长立幼的氏族规矩,又为自己不能按心意传位给孙子姬昌而终日忧闷,以致抑郁成疾。长子太伯看出父亲的心意,为了顺应父亲的意愿,太伯和大弟仲雍相商之后,在父亲生病时,托言往衡山采药而一起从岐山出走,离开周原,来到岐山西面的吴山(今宝鸡新街镇境内),以便其父传位于季历。这就是孔圣人所说的“三以天下让”的第一让。

太伯和仲雍来到吴山后,建立了氏族国“勾吴”。吴政权与季历的周政权相呼应。

2. 二让,奔梅里

太伯、仲雍入吴山不返,因此季历就被改立为太子。不久,古公亶父因病去世。为了照顾氏族的传统,古公亶父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季历将王位归还给太伯。太伯、仲雍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后,立即从吴山赶回奔丧。这时,季历依照父亲的遗命,一定要把王位让给太伯。太伯坚辞不受。后来,太伯见几次推让不成,只好带仲雍连夜再次回到吴山。后带领部分吴人举族南迁,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最后来到太湖之滨的无锡梅里。

为了让太伯继承王位,季历再次派人到梅里诚请太伯回去即位。太伯为了表示无意继承王位,与仲雍断发毁容,改从土著先民纹身断发习俗。在以礼仪文明自称的周朝看来,只有遭刑罚的人才断发纹身。当信使临走时,太伯传话给季历:“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就是太伯的第二让。

3. 三让,为至德

太伯、仲雍定居梅里后,把岐山当时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原本以捕鱼、打猎为生的南方,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并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开发江南,使得原本人烟稀少、土地肥沃的梅里地区逐渐成为人丁兴旺、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太伯、仲雍也因之被当地民众拥举为部族首领。后来,太伯在吴越之地营建城邑,组建国家,国号仍称勾吴,占有太湖以东到海,北抵长江地域。勾吴国逐渐发展壮大,终于在东南沿海站稳了脚跟,至太伯四世孙周章被周武王封为吴子并赐予国号为吴国始,吴国逐渐强大,成为春秋时期“春秋五霸”之一。

吴国建立后,太伯却一直不肯称王,只让人们称“伯”,且无子嗣,为的就是把王位让给弟弟仲雍。公元前1193年,季历被商王杀害,季历的儿子昌请太伯回周原继位,太伯再次让位于昌。姬昌后来成为周文王。太伯去世后,仲雍成为吴国国王。这就是让百姓肃然起敬的太伯第三让王。

孔圣人在《论语》中对此赞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在孔子看来,太伯的品德已达到了极高境界,人世间再也找不出什么言语来形容他的美德了。因而太伯被称为“三让王”。缘自孔子的上述赞语,吴氏后人就把“至德”“三让”作为宗祠的堂号,称为“至德堂”“三让堂”。

二、吴季札的“三让王”(后)

季札是泰伯(太伯)之弟的第十九世孙,人称延陵季子。他是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与孔子齐名的圣人,曾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季札博学多才,懂得政治、军事,精通音乐、舞蹈。季札“让国”“观乐”“挂剑”等典故,传颂至今。从公元前561年起,季札效仿祖辈太伯的做法,“三让王位”更是为人称道。

1. 一让,遵守周礼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61年,太伯的第18世孙吴王寿梦离世。寿梦生有四子: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四子之中又以季札最为贤明,从小聪明过人,熟读诗书,通晓礼仪,仁、义、礼、让四德俱全,深受父王寿梦的喜爱。寿梦想要传位给他,季札一再谦让,认为不适情理,坚辞不受。因此,朝上只好立长子诸樊,由他代理执行政务,掌管国家政权,等办完父亲的丧事和守丧结束后再说。此为季札一让国。

2. 二让,崇尚守节

公元前560年,诸樊元年,孝顺的诸樊守孝结束,脱下孝服,就要让位于季札。他说:“我愿达前王之义”,命季札遵吴王遗诏而即位。但季札还是不接受。后来他见推托不掉,便放弃了自己的王室身份,带领自己的家人来到延陵(今常州市武进区)耕作。众人见季札心意已决,也不好再强求,诸樊只好正式立王。这是季札二

让国。

3. 三让,洁身清行

据《吴越春秋》记载:“(余祭)十七年,余祭卒。余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让,逃去。”季札说,我已明言不接受王位,并已举子臧守义之例。今欲洁身清廉,崇尚品德,仁义处世,富贵对于我而言,像秋风吹过耳朵一样。

又据《公羊传》记载:诸樊兄弟誓约,王位不以父子相传,而改为兄弟继承。为了早日把王位传给季子,诸樊领兵伐楚,公元前547年,战死沙场。群臣遵照寿梦遗命和兄弟誓约,立次子余祭为王。余祭一面把“季札封于延陵,号曰延陵季子”,一面效法长兄,于公元前527年“好勇轻身而亡”。余祭去世,弟余昧立。公元前523年,余昧也身患重病去世。余昧临终前,不忘父王遗命,授位给季札。但季札仍然不接受王位,并再次出逃,回到延陵。吴人遂立余昧之子僚为王。季札认可,方重回朝中辅政。这是季札三让国。

季札让国的事迹写进了《史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吴越春秋》等史书里,后人称之为“后三让”。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季札为“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的仁德之人。季札以贤德三次让国,继承了先祖太伯和仲雍的美德,故他被后人奉为“至德第三人”。又因其封地为延陵邑,也称其为“延陵季子”。其后人也把堂号取名“延陵堂”。

备注:吴太伯名中的“太”字,在《史记》《辞源》等中,都是用“太”;就是在《中华姓氏通书·吴姓》和我们《吴氏支谱》等书刊中,也都为此。而在无锡梅里的“吴泰伯庙”和“泰伯墓”以及《论语》中孔子对太伯的评论,又用的是“泰”。经查文献对本字的考辨,《汉典》注为:“太、泰、大三个字,在古代常常通用。”故应视为“太、泰”通用,称太伯、泰伯均可。

(参考资料:1.刘佑平著《中华姓氏通书·吴姓》;2.吴氏宗亲联合网;3.网摘传统文化《吴姓》部分。——作者注)

(作者系原淮阴县韩圩乡吴大园村人)

淮 安 & 年 谱

(十九)清(11)

1819年 嘉庆二十四年

河南省漫水下注,涡淮泛滥,泗州人民田庐被淹,上谕将泗州屯坐民户军丁俱赏一月口粮,蠲免本年应征地丁正银。

1820年 嘉庆二十五年

大约是年前后,外地人在淮安河下兴建一批会馆。最早是新安会馆,相继建成的有福建会馆、润州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江西会馆、楚人公所等。

1821年 道光元年

夏 安东六塘河堤溃,倒灌硕项湖。沐水在沐阳县大坊集北决,直入青伊湖,其东出入涟河之道遂废。

乾嘉以来 额定南河岁修银450万两,如遇决口或漫溢则另加。平时一般年增加200万两左右,大灾时增加1000万两以上。

本年孙长源拔贡。长源,字问津,清河人,善鼓琴,著有《琴鹤》《琴旨补正》《琴谱拙存》《琴况》四种琴学书,为时人推服。

1823年 道光三年

裘安邦任南河中军副将,操练兵丁,过于严苛,不服而哗。裘以“鼓噪”罪名稟请严办,河帅不同其议,齟齬旬余,后两江总督来清河,始得解。兵士感激。

1824年 道光四年

河督黎世序卒。世序任河督13年,治水有功。生活简朴,子女衣饰如平民。兴学校,劝民纺织,为地方兴利很多。死之日,清江浦全邑罢市,街头巷尾一片哭声,为数十年所未有。

世序死后,清河人汪椿尽毁所著,谓从此世无知音。椿,字春园,清天文历算学家,著有《推太岁法》《太岁星法》《推太阴法》《日知录补注》

数十卷,黎世序最为赏识。

十二月 黄河大涨,高堰十三堡决口百余丈,坏石工万余丈。洪泽湖全湖倾注,淮、扬二郡皆为鱼鳖。

1825年 道光五年

正月 朝廷命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至南河查办洪泽湖决堤事,将两江总督孙玉庭革职,河督张文浩革职并枷号河岸示众,后戍伊犁。

自上年至本年,运河御黄坝分溜倒灌,从清口到淮、扬,淤为平陆。

道光六年至七年

两江总督琦善治河,开放王营减坝,导黄河主流临时北趋,然后疏浚正河河床,费帑金600万两,工成后,讫无成效。朝廷派大学士蒋攸钰、尚书穆彰阿来苏查办,革琦善侯爵,其他人分别处治。时人有“五鬼闹王营”之说。(五鬼:琦善冒失鬼,副总河潘芸阁怂恿鬼,总河张芥航冤屈鬼,淮扬道邹公眉刻薄鬼,同知唐文睿糊涂鬼。)

△因总督琦善开减坝泄黄,清河北乡荡析,知县唐汝明奉檄赈抚,周行泥淖,境内获安。县治地当剧冲,汝明不事应酬,每微服出访,掌握实情,境内大治。唐历知安东、山阳、宝应县事,皆有循声。

△查禁粮船水手设教。时各帮粮船设有三教(潘安、老安、新安),祀“罗祖”神。各教主称“老官”。三教共有教徒四五万人。

(资料主要来源于荀德麟执编的《淮阴史事编年》)

